

河陰之變新探：以尒朱榮為中心的討論*

胡勝源 **

南宋以來的傳統史學重視夷夏之別，多半將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視為河陰之變的起因，並以尒朱榮的胡人背景，論定其政治傾向。本文嘗試回到北宋史學的脈絡，以尒朱榮為中心，考察他與孝明帝、孝莊帝的關係、他對孝文帝一系的重視，重新探討河陰之變的起因與影響。

河陰之變的起因方面：本文分析了尒朱榮、元子攸與孝明帝的關係，認為尒朱榮與元子攸皆屬忠於孝明帝的帝黨，才能順利合作推翻胡太后的統治。河陰之變發於費穆對尒朱榮的獻策，本文以為費穆、禁軍對漢化政策不滿的可能性並不高，推測費穆是因追求功成名就才出此策略。學界大多將尒朱氏與六鎮鎮民歸於同類，本文則將之分為尒朱氏、六鎮豪強、六鎮下層鎮民。本文認為，尒朱氏與六鎮豪強不屬於同一類人，他們會合作鎮壓反漢化的六鎮之亂，是因共同的「擁魏」立場；這也反映在他們所擁立的皇帝皆與孝文帝有密切的關係上。

* 非常感謝匿名審查人對本文的指導。審查人不僅仔細閱讀本文，更提點筆者修改方向，若文中有任何的錯誤仍當由筆者負責。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聯絡地址：10610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No.162, Sec. 1, Heping E.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10, Taiwan (R.O.C.))。

河陰之變的影響方面：本文認為河陰之變讓尙朱榮欲立功補過，成就了一番功業，然而遷都之舉讓孝莊帝聯想到董卓前鑑，顯赫功業又讓孝莊帝芒刺在背，最終使孝莊帝對尙朱榮痛下殺手。河陰之變中，尙朱榮放棄篡位，開啟了北魏前所未有的「主弱臣強」體制，讓他與孝莊帝的衝突不斷。尙朱榮死後，高歡與宇文泰皆沿襲此一體制，形成東西魏政治的根本架構。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河陰之變、尙朱榮

一、前言

北魏武泰元年(西元 528 年)四月十三日發生的河陰之變，為北方往後四十餘年的動亂拉開了序幕。在河陰，爾朱榮殘殺了朝士二千餘人，¹犯下人神共憤的罪行，被傳統史家所嚴厲譴責。陳寅恪先生認為河陰之變背後有更深刻的文化衝突內涵，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指出：

及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其漢化程度更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則已達頂點，而逐漸腐化矣。然同時邊塞六鎮之鮮卑及胡化之漢族，則仍保留其本來之胡化，而不為洛都漢化之所浸染。故中央政權所在之洛陽其漢化愈深，則邊疆六鎮胡化民族對漢化之反動亦愈甚，卒釀成六鎮之叛亂，爾朱部落乘機而起。至武泰元年(公元五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河陰之大屠殺，遂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對漢化之公開表示，亦中古史劃分時期之重要事變也。²

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也說：

故自宣武以後，洛陽之漢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時之代北六鎮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陽之漢化腐化力因隨之而益強，故魏末六鎮之亂，雖有諸原因，如飢餓虐政及府戶待遇不平之類，然間接促使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爾朱榮河陰之大屠殺實胡族對漢化政策有意無意中之一大表示，非僅爾朱榮、費穆等一時之權略所致

¹ 河陰之變中的死難人數，史書記載不一。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點校本)，卷48，〈爾朱榮傳〉，頁1753。與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點校本)，卷10，〈孝莊紀〉，頁248，皆稱：「公卿兩千餘人」。而《魏書》，卷74，〈爾朱榮傳〉，頁1648，所記載的數字卻是「死者千三百餘人」，未知孰是？陳爽先生據事後追贈詔書中有「白民贈郡鎮」或「七品以下及民郡鎮」推斷出死難者中應包含很多王公大臣的侍從。而從《魏書》，卷74，〈爾朱榮傳〉，稱：「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及《魏書》，卷10，〈孝莊紀〉，稱「公卿已下兩千餘人」推斷出一千三百人可能是指遇害官員的人數，而兩千餘人則是可能被害的所有人數，陳先生的考證縝密，從而，在此採兩千餘人之說。參陳爽，〈河陰之變考論〉，《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4集(北京，2007.08)，頁326-327。

²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197。

也。……其後高歡得六鎮流民之大部，賀拔岳、宇文泰得其少數……，東西兩國俱以六鎮流民創業，初自表面觀察，可謂魏孝文遷都洛陽以後之漢化政策遭一大打擊，而逆轉為胡化，誠北朝政治社會之一大變也。³

陳寅恪先生認為河陰之變不只是爾朱榮、費穆一時權略所造成的，背後還隱含了六鎮對孝文帝漢化政策的不滿，遂使漢化政策逆轉為胡化。對此，他在《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中有更深入的闡述：

殺洛陽朝士，逐京邑士子，是六鎮鮮卑化軍人的目的，爾朱榮代替他們辦到了。爾朱榮發動河陰之變是「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說」。費穆是禁軍將領，禁軍已經發動過一次反張仲瑀求銓別選格的暴亂，殺朝士可以說是費穆假手羯胡武士完成的。⁴

陳先生將河陰之變放在六鎮之亂的脈絡中加以把握，成為漢化反動的具體現象，賦予此一事變文化衝突的豐富意涵。學界此後大多也沿襲陳先生揭露的架構對河陰之變做更進一步的發揮，如：唐長孺，〈試論魏末北鎮鎮民暴動的性質〉、⁵〈北魏末期的山胡敕勒起義〉、⁶黃修明，〈論爾朱氏軍事集團〉、⁷宋大川、夏連保，〈北魏河陰之變述論〉、⁸小島典子，〈北魏末期の爾朱榮〉、⁹窪添慶文，〈河陰の變小考〉、¹⁰蘇小華，〈試論爾朱氏集團的興亡〉、¹¹李文才、王婷琳，〈爾朱氏興衰的政治與文化考察〉、¹²王愛玲，〈尔

³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48。

⁴ 陳寅恪講述、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雲龍出版社，1995），頁316-317。

⁵ 唐長孺，〈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7-57。

⁶ 唐長孺，〈山居存稿〉，頁62-99。

⁷ 黃修明，〈論爾朱氏軍事集團〉，《四川社會科學院學報》，第5期（成都，1990.05），頁87。

⁸ 宋大川、夏連保，〈北魏河陰之變述論〉，《晉陽學刊》，第5期（太原，1991.05），頁68-69。

⁹ 小島典子，〈北魏末期の爾朱榮〉，《史窗》，第58期（京都，2001.08），頁319-320。

¹⁰ 窪添慶文，〈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頁452-453。

¹¹ 蘇小華，〈試論爾朱氏集團的興亡〉，《晉陽學刊》，第3期（太原，2005.03），頁70。

¹² 李文才、王婷琳，〈爾朱氏興衰的政治與文化考察〉，《南京曉莊學院學報》，第4期（南京，2007.04），頁31-34。

朱氏與北魏政治》、¹³陳爽，〈河陰之變考論〉、¹⁴鄭建民，《爾朱集團和北魏末期的政局》。¹⁵其中，大大拓展陳先生理論的是唐長孺先生與陳爽先生的研究。唐長孺先生在陳寅恪先生理論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區分六鎮鎮民的階級特性，認為六鎮中存在嚴重對立的兩個階級，故六鎮亂起，即遭逢六鎮豪強的抵抗。不僅如此，連大多數的胡族酋帥都參與鎮壓，最後六鎮之亂在六鎮豪強與胡族酋帥攜手下被平定；而陳爽先生則從陳先生禁軍首謀說中得到啟發，考察出孝莊帝與爾朱榮皆有禁軍背景，認為河陰之變乃洛陽禁軍集團、孝莊帝及其支持者與爾朱榮集團為了清除重文輕武的洛陽公卿集團所共同策劃的事件，是一有計劃性的行動。

學界也有與陳先生不同觀點的說法，如吳少珉，〈試論北魏「河陰之變」〉站在階級鬥爭的立場，認為河陰之變是延續著屬於農民起義六鎮之亂之脈絡，打破了腐敗北魏王朝，進而掃蕩漢化的鮮卑代北土族與漢人土族大地主。¹⁶谷川道雄，〈北魏末期的內亂與城民〉，以為六鎮之亂是城民對孝文帝以來實行門閥主義原理的反抗，爾朱氏雖承襲這股勢力卻未按照新的原理建立國家而導致滅亡。¹⁷王延武，〈北魏末的文化模式與爾朱榮的敗亡〉則對漢化反動說提出反思，他認為河陰之變包含了兩種性質不同的內容，一是爾朱榮循鮮卑——漢文化模式介入宮廷之爭；一為爾朱榮欲稱帝，而突破鮮卑——漢文化的規範，但被迫中止。¹⁸吳少珉先生的觀點，較偏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思考模式，特殊性較為不夠，可備一說。谷川道雄先生的觀點廣義來看，亦可視為陳先生理論的延伸。而王延武先生關於河陰之變性質的看法雖與陳先生不同，卻沒有說明鮮卑——漢文化的明確內涵，是稍嫌不足之處。

¹³ 王愛玲，〈爾朱氏與北魏政治〉(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94-103。

¹⁴ 陳爽，〈河陰之變考論〉，頁309-344。

¹⁵ 鄭建民，〈爾朱集團和北魏末期的政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43-48。

¹⁶ 吳少珉，〈試論北魏「河陰之變」〉，《史學月刊》，第1期(開封，1983.01)，頁26-27。

¹⁷ 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154-157。

¹⁸ 王延武，〈北魏末的文化模式與爾朱榮的敗亡〉，《中南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武漢，2003.06)，頁105-109。

陳寅恪先生擅長洞見歷史底蘊，架構出宏大的歷史架構，成為學界理解北朝末期到隋、唐歷史發展趨向的基本常識，至今無人能出其右。然而，在比較枝微末節的部分，受限於時代環境，陳先生著墨不多。如陳先生以為河陰之變是禁軍與胡族不滿漢化政策的表徵，然而在河陰之變中禁軍亦遭到極大打擊，《北史》，卷 48，〈爾朱榮傳〉載河陰之變後洛陽宮城的情況：「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直衛空虛，官守廢曠。」¹⁹可知，禁軍沒有因河陰之變得到政治利益，反而折損逃散殆盡，禁軍對漢化政策的仇恨是否已達到與洛陽朝臣同歸於盡的地步，是值得深思的問題。此外，陳先生將爾朱榮與反叛北魏朝廷的六鎮鎮民，歸於同一類人。但據唐長孺先生的研究，爾朱榮不但是參與北魏政權的部落貴族，往後更是自始自終堅決鎮壓六鎮之亂，是鎮民最兇惡的敵人。²⁰可見，陳先生的論點似仍有一些討論空間。

陳寅恪先生的觀點可以說是南宋以來傳統史學的沿承，宋儒葉適即以為：

爾朱榮以部落酋長，居秀容不毛，地只一縣，眾才數千，世為邊藩，朝權輕重，曾莫之預；一旦稱兵，沈太后幼主，獵舉國士如狐兔，散葛榮百萬，擒蕭寶寅、万俟醜奴，天下大難略盡，雖身不終，而魏竟以亡。然則權與力皆不足而若是，何也？孝文藉累世富盛，志慕古人，解縱維索，護齊癰疽，既無回斡風俗之功，反受動搖根本之害，榮之禍實自取之，悲夫！²¹

認定河陰之變乃是孝文帝改革失敗所造成的結果；清儒王夫之也說：

夫拓拔氏之無人也，非但胡后之虐，鄭儼、徐紇之姦，耗士氣於淫昏也，其由來漸矣。自遷洛以來，塗飾虛偽，始於儒，濫於釋，皆所謂沐猴而冠者也。靡天下於無實之文，自詫昇平之象，強宗大族，以侈相尚，而上莫之懲，於是精悍之氣消矣，樸固之風斲矣。內無可用之禁兵，外無可依之州鎮，部落心離，浮華氣長；一旦群雄揭

¹⁹ 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榮傳〉，頁1754-1755。

²⁰ 唐長孺，《山居存稿》，頁90-91。

²¹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點校本)，卷34，「魏書·爾朱榮」條，頁506。

竿而起，出入於無人之境，唯其所欲為，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哉？
此亦一寇讎，彼亦一寇讎也，舍此而又奚之也！²²

認為孝文帝的改革乃是沐猴而冠，不僅孕育出北魏極端腐化的浮華風氣，最後更釀成天下大亂。葉適、王夫之與首倡北齊胡漢衝突說的元儒胡三省，²³史論中皆有深沈亡國之痛的烙印，對夷夏之別特別敏感，但北宋士人便無這樣的感受。饒宗頤先生以為宋代士人雖皆尊《春秋》大義，解釋上卻不相同，對《春秋》主旨：「尊王攘夷」的理解就有差異，北宋仍以「尊王」為主旨，南宋則以「攘夷」為旗幟。²⁴比起南宋士人，較無時代包袱的北宋士人更能平心看待這段歷史。若論北宋史學，《資治通鑑》無疑是其中翹楚。《資治通鑑》除了增補許多重要史料外，在史事的選取、編排以及用字上皆能看出編撰者劉恕的觀點。本文不揣淺漏，嘗試借鏡北宋史學，與南宋以降的傳統史學對話，並以余朱榮為中心，聚焦在他與孝明帝、孝莊帝的關係，重新理解河陰之變的起因與影響。

在徵引史料方面，北齊魏收修成的《魏書》無疑是記錄當代的一手史料，但過去因魏收「夙有怨者，多沒其善」，而被譏為「穢史」，²⁵尤其是〈余朱榮傳〉又傳是納余朱文略金後所做的佳傳，²⁶被清人趙翼批評為是舞文之作，²⁷周一良先生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北史收傳及北齊書余朱文暢傳謂余朱文略大遺收金，請為其父作佳傳。今閱魏書七四榮傳，頗載詔疏，乃收書體例本爾，非特愛於榮。趙甌北謂閱者但覺功多罪少，是收舞文，則周納之詞也。且榮傳於舉兵弑君諸大端莫不書之，而河陰誅朝臣之慘酷，鑄己像而不成之僭越，亦皆未遺漏，此尚為美傳乎？其論云：「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

²² 王夫之，《讀通鑑論》（臺北：里仁書局，1985），卷17，「梁武帝」條，頁576。

²³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點校本），卷168，頁5201，胡三省注：「楊愔受託孤之寄，不能尊主庇身者，鮮卑之勢素盛，華人不足以制之也。」

²⁴ 饒宗頤，《中國歷史上之正統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75。

²⁵ 李延壽，《北史》，卷56，〈魏收傳〉，頁2031-2032。

²⁶ 李延壽，《北史》，卷56，〈魏收傳〉，頁2031。

²⁷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13，「魏書多曲筆」條，頁264。

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其詞是褒是貶昭然明白，乃後人斷章取義，如史通論贊之比，謂收受榮子之金而擬榮於伊霍，全失史家抑揚之意，不亦疏乎？自來作史之人每難逃於污穢，得金受米，故已有先例矣。²⁸

趙翼也不得不承認：「今接收書，大概著其功而減其惡，……然收書河陰之役，榮殺帝兄弟，並幽帝於別帳，將弑之，已使趙元則作禪文，因鑄已象不成，乃還奉莊帝之處，亦終不能稍諱，則亦未大失實也。」²⁹從而，《魏書》的記載應屬可信；此外，魏收的史論亦富含深意，本文多受啟發。東魏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約成於東魏武定八年，比書成於北齊天保五年的《魏書》還來得早。³⁰此書除了記述洛陽佛寺之外，對魏末諸史事亦多有涉獵，近年來史學界多認為其中蘊含微言大義，乃是一部私修史書，其內容大致可信，可補《魏書》之不足。³¹唐李延壽著《北史》，其〈尗朱榮傳〉雖依《魏書》，卷 74，〈尗朱榮傳〉架構，卻增添更多史料，因此，本文關於尗朱榮的部分基本上以《北史》，卷 48，〈尗朱榮傳〉為本，若是《北史》，卷 48，〈尗朱榮傳〉所無，才據《魏書》，卷 74，〈尗朱榮傳〉。北宋司馬光編《資治通鑑》，北魏末一段材料大致以《北史》為主，兼採《洛陽伽藍記》，更參考了《後魏國典》、《南北史》等佚書，故多有材料為《魏書》、《北史》所不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³²

二、河陰之變的起因

河陰之變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孝明帝與胡太后的權力衝突。孝明帝受制於

²⁸ 周一良，《周一良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341-342。

²⁹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卷13，「尗朱榮條」，頁265。

³⁰ 陳識仁，〈《洛陽伽藍記》與北朝史學〉，收入宋德熹編，《中國中古社會與國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頁290-291。

³¹ 陳識仁，〈《洛陽伽藍記》與北朝史學〉，頁269。

³² 唐長孺，《唐書兵制箋正(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71-74。

胡太后及其黨羽鄭儼、徐紇，忍無可忍下，令秀容酋豪尒朱榮率軍入京。³³一直關注洛都動向的尒朱榮，在得到孝明帝的命令後，馬上興兵入洛。³⁴原本孝明帝已用私詔把尒朱榮軍止於上黨，³⁵但此時孝明帝被胡太后聯合鄭儼、徐紇所毒殺，胡太后為控制朝局立三歲的元釗為帝。³⁶尒朱榮聽到這個消息大怒，他對元天穆說：「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率鐵騎赴哀山陵，翦除姦逆，更立長君，何如？」³⁷他在之後的上表裡更說：「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邇，改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³⁸胡太后立幼君是為方便控制朝政，尒朱榮則反其道而行主張立長君，而且這個人還要符合兼具德行，聲譽遠近皆知的條件。

尒朱榮也真的找到這樣的人。早在尒朱榮上表之前，尒朱榮就派尒朱天光、奚毅到洛陽與尒朱世隆密商皇帝人選，尒朱天光隨後與時年二十二歲的元子攸接觸。³⁹元子攸是彭城王元勰的兒子；⁴⁰元勰是孝文帝之弟，曾經盡心服侍病中的孝文帝，後來又擁立宣武帝，是被譽為能與周公、霍光媲美的人物。⁴¹元子攸不但「家有忠勳，且兼人望」，年紀又大也符合尒朱榮所定的條件，加上尒朱榮又「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⁴²尒朱榮再無懷疑，大軍到了河陽與元子攸會合，過黃河後便請他即帝位。此舉讓尒朱榮甚得人心，使他兵不血刃地就

³³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1。

³⁴ 魏收，《魏書》，卷74，〈尒朱榮傳〉，頁1645-1646；李延壽，《北史》，卷49，〈賀拔岳傳〉，頁1800。

³⁵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1。

³⁶ 李延壽，《北史》，卷13，〈宣武靈皇后胡氏傳〉，頁505；魏收，《魏書》，卷9，〈肅宗紀〉，頁248。

³⁷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2，頁4739；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卷1，「永寧寺」條，頁30。

³⁸ 魏收，《魏書》，卷74，〈尒朱榮傳〉，頁1647。

³⁹ 李延壽，《北史》，卷48，〈尒朱榮傳〉，頁1753。

⁴⁰ 魏收，《魏書》，卷10，〈孝莊紀〉，頁255。

⁴¹ 魏收，《魏書》，卷19，〈元勰傳〉，頁703-705。

⁴² 魏收，《魏書》，卷74，〈尒朱榮傳〉，頁1647。

抵達洛陽附近。⁴³不僅如此，當洛陽朝臣得知尒朱榮擁立元子攸為帝，便「百僚相率，有司奉璽紱，備法駕，奉迎於河梁。」⁴⁴連胡太后也感受到這股龐大的壓力，在百官迎接孝莊帝前即落髮為尼，尒朱榮所欲聲討的鄭儼、徐紇也紛紛逃歸鄉里。⁴⁵上述史事中，令人不解的是清君側乃非常之事，攸關孝明帝政治生命的一場豪賭，孝明帝為何會輕率委之「權與力皆不足」的秀容豪酋尒朱榮呢？

我們知道尒朱榮的女兒是孝明帝嬪妃，⁴⁶他又歷任直寢將軍、直閣將軍、武衛將軍等禁軍職務。⁴⁷胡太后再次臨朝後，一一除去孝明帝身邊親信，使得母子嫌隙日深。⁴⁸與此同時，尒朱榮的勢力也逐步壯大，竟到「魏朝不能制」、「魏朝憚之」的地步。⁴⁹這裡的「魏朝」指的是胡太后，因孝明帝完全能駕馭尒朱榮。當孝明帝欲親征杜洛周時，計畫以尒朱榮為左軍；葛榮合併杜洛周餘眾後，「(尒朱)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州。」孝明帝不准許，便不了了之；⁵⁰孝明帝以私詔令尒朱榮入洛、命他止步於上黨，尒朱榮皆一一遵從。上述種種，都顯示尒朱榮聽命於孝明帝。尒朱榮以直寢、游擊將軍的身分回秀容召集義勇的時間在正光中，正光是孝明帝元服親政後改的年號，⁵¹其後「蠕蠕主阿那瓌寇掠北鄙，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崇北征。」⁵²李崇北征柔然在正光四年，胡太后再次臨朝聽政是在兩年後的孝昌元年，⁵³因此這裡的「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崇北征。」體現的是孝明帝的意志。往後，尒朱榮便在禁軍系統中一路晉升(直閣將軍→武衛將軍→右衛將軍)，入洛前的四個月，尒朱榮被任

⁴³ 魏收，《魏書》，卷44，〈費穆傳〉，頁1004。

⁴⁴ 魏收，《魏書》，卷9，〈孝莊紀〉，頁255。

⁴⁵ 李延壽，《北史》，卷13，〈宣武靈皇后胡氏傳〉，頁505；魏收，《魏書》，卷93，〈鄭儼傳〉，頁2007；魏收，《魏書》，卷93，〈徐紇傳〉，頁2008。

⁴⁶ 李延壽，《北史》，卷48，〈尒朱榮傳〉，頁1754。

⁴⁷ 魏收，《魏書》，卷74，〈尒朱榮傳〉，頁1644。

⁴⁸ 魏收，《魏書》，卷13，〈宣武靈皇后胡氏傳〉，頁339-340。

⁴⁹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1，頁4715；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2，頁4737。

⁵⁰ 魏收，《魏書》，卷74，〈尒朱榮傳〉，頁1645。

⁵¹ 魏收，《魏書》，卷9，〈肅宗紀〉，頁230-231。

⁵² 魏收，《魏書》，卷74，〈尒朱榮傳〉，頁1644。

⁵³ 魏收，《魏書》，卷9，〈肅宗紀〉，頁234、240。

命為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進位儀同三司。⁵⁴此後，尙朱榮即常與元天穆、賀拔岳密謀「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群盜。」⁵⁵而「內誅嬖倖，外清群盜」正是孝明帝的宏願，他曾三次欲親征六鎮之亂，皆因故不行；⁵⁶也厭惡鄭儼、徐紇擅政專權，卻因胡太后而不敢有所動作。對此，《北史》，卷 6，〈齊神武紀〉作：「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⁵⁷而《資治通鑑》則作「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群盜，兩人皆勸成之。……魏肅宗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⁵⁸多一個「亦」字，便將尙朱榮與孝明帝的一致立場鮮明地展現出來。北魏朝廷也承認這一點，《北齊書》，卷 21，〈封隆之傳〉：

於時(孝武帝朝)朝議以尙朱榮佐命前朝，宜配食孝明廟庭。隆之議曰：「榮為人臣，親行弑逆，安有害人之母，與子對饗？考古詢今，未見其義。」從之。⁵⁹

尙朱世隆執政時，將尙朱榮配饗孝文帝廟庭，⁶⁰高歡起兵推翻尙朱氏政權後，北魏朝廷重新評價尙朱榮的歷史地位，才有上述這番討論。而朝議竟以尙朱榮「佐命前朝」，欲將其配饗孝明帝廟庭；若論尙朱榮對北魏的貢獻，如擒葛榮，誅元顥等皆成就於孝莊帝朝，若因其與孝莊帝的恩怨糾葛，亦可將之配食宣武帝，最後卻是配饗母親被尙朱榮所殺的孝明帝，理由甚難理解，但如果我們將之追溯至胡太后與孝明帝的衝突，也許能略知端倪。

「內誅嬖倖，外清群盜」是孝明帝與尙朱榮的共識。尙朱榮入洛前為征討六鎮亂民三次上表朝廷，而孝明帝打算親征杜洛周時亦計畫以尙朱榮

⁵⁴ 魏收，《魏書》，卷9，〈肅宗紀〉，頁247-248；魏收，《魏書》，卷74，〈尙朱榮傳〉，頁1645。

⁵⁵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2，頁4738。

⁵⁶ 魏收，《魏書》，卷9，〈肅宗紀〉，頁243、246。

⁵⁷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1。

⁵⁸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2，頁4738-4739。

⁵⁹ 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點校本)，卷21，〈封隆之傳〉，頁302。

⁶⁰ 李延壽，《北史》，卷48，〈尙朱榮傳〉，頁1762；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2，「平等寺」條，頁100-101。

為左軍，可見，雙方目標起初是「外清群盜」。⁶¹但當胡太后及其黨羽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時，孝明帝便將目標轉為「內誅嬖倖」，令尗朱榮率軍入洛。胡太后等人得悉尗朱榮出兵的消息，心生恐懼竟毒殺孝明帝，尗朱榮聞之大怒，即依孝明帝原訂計畫，「率鐵騎赴哀山陵，翦除姦逆。」百官出迎尗朱榮擁立的元子攸，顯示尗朱榮入洛之舉已獲得群臣的認可，尗朱榮遂將胡太后與幼主押至河陰，不顧太后解釋，拂衣而起，將他們一起沈入黃河，為孝明帝報仇雪恨。⁶²北魏朝廷會認為尗朱榮有功於孝明帝，魏收會稱尗朱榮因「援主逐惡之圖」而起兵，⁶³當是緣由於此。

從上述所論，可以說尗朱榮是孝明帝的親信。他高舉追究孝明帝死因的旗幟，舉兵入洛，有明確的正當性。但尗朱榮能讓洛陽群臣認同其犯上行徑，關鍵還是在元子攸的合作。然而，兩人會順利攜手內情也不單純，王夫之認為：

爾朱榮之暴橫，不擇而狂噬，有目皆見，有耳皆聞也。立元子攸以為君，而挾之犯闕。以榮之勢如彼，而子攸其能自許為榮之君乎？予然一身，孤危無輔，而爾朱天光一往告，子攸遽欣然潛渡，謂榮之且以己為君也，榮已目笑之矣。然猶曰榮惡未著而不察也。⁶⁴

王夫之認為元子攸在政治判斷上極為幼稚，才不顧自身「孤危無輔」的處境與「暴橫」的尗朱榮相會。但，更根本問題是，尗朱榮為何擁立元子攸為帝呢？尗朱榮的理由是元子攸父親元勰有「忠勳」，元子攸本人又有人望；即便如此，尗朱榮也可立血統更加純正的嗣子元劭。且，元劭「少有氣節」，屢次抵禦梁朝的騷擾，與元子攸相比並不遜色，更重要的是他也不滿胡太后的統治，⁶⁵但尗朱榮卻獨鐘元勰三子元子攸，當有其他因素。我們應注意到，元子攸「幼侍肅宗書於禁內，……雅為肅宗所親待。常直禁中。」後

⁶¹ 魏收，《魏書》，卷74，〈尗朱榮傳〉，頁1645-1646。

⁶² 魏收，《魏書》，卷13，〈宣武靈皇后胡氏傳〉，頁340；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2，頁4741。陳爽先生以為史書記述多有歧異，河陰之變的過程遂採《資治通鑑》的排比，本文亦因之。參陳爽，〈河陰之變考論〉，頁321。

⁶³ 魏收，《魏書》，卷74，〈尗朱榮傳〉，頁1657。

⁶⁴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17，「梁武帝」條，頁572。

⁶⁵ 魏收，《魏書》，卷21下，〈元劭傳〉，頁584。

來又被胡太后特意排擠，⁶⁶他是孝明帝的心腹，殆可確定。元子攸「常直禁中」，爾朱榮與從弟爾朱世隆皆曾擔任禁軍諸職，⁶⁷他們對孝明帝與元子攸的關係應有瞭解，甚或可能與元子攸早有交往。從而，他們以孝明帝心腹元子攸為擁立對象，頗有延續孝明帝政治路線的意味，憤恨胡太后作為的洛陽群臣才會前去迎駕。而對元子攸來說，他自小受孝明帝親待，朝夕相處，「肅宗之崩，事出倉卒，時論咸言鄭儼、徐紇之計。於是朝野憤歎。」⁶⁸元子攸的感受想必更加強烈。爾朱榮高舉義旗，問罪鄭儼、徐紇及幕後的胡太后，元子攸應是十分認同，否則也不會在局勢未明時即賭上家族命運毅然帶著兄弟跟爾朱榮相會。⁶⁹往後他在誅殺爾朱榮後所下的詔書中也以「共成鴻業」一語來形容兩人當初的合作。⁷⁰可知爾朱榮與元子攸皆屬忠於孝明帝的帝黨，同有為孝明帝復仇的政治理念，自然容易結合在一起。因此，我們可以說，爾朱榮興兵入洛一事乃是帝黨對后黨鳩害孝明帝的反撲，往後發生的河陰之變是此事突乎其來的變奏曲。

一場帝黨針對后黨的舉兵，最後卻演變成對洛陽群臣的瘋狂屠殺，關鍵在費穆的獻策，《魏書》，卷 44，〈費穆傳〉載：

爾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及榮推奉莊帝，河梁不守，穆遂棄眾先降。穆素為榮所知，見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者，正以推奉主上，順民心故耳。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伏。今以京師之眾，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內難作矣。」⁷¹

費穆的建議顯然甚合爾朱榮心意，遂引發河陰之慘劇。《魏書》，卷 74，〈爾朱榮傳〉載：

乃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既集，列騎圍遶，責天

⁶⁶ 魏收，《魏書》，卷 10，〈孝莊紀〉，頁 255。

⁶⁷ 魏收，《魏書》，卷 74，〈爾朱世隆傳〉，頁 1668。

⁶⁸ 魏收，《魏書》，卷 13，〈宣武靈皇后胡氏傳〉，頁 340。

⁶⁹ 魏收，《魏書》，卷 10，〈孝莊紀〉，頁 255。

⁷⁰ 魏收，《魏書》，卷 10，〈孝莊紀〉，頁 265。

⁷¹ 魏收，《魏書》，卷 44，〈費穆傳〉，頁 1004。

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害，靈太后、少主其日暴崩。⁷²

然而，《北齊書》，卷 20，〈慕容紹宗傳〉卻說：

及榮稱兵入洛，私告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剪，恐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誅之，謂可爾不？」紹宗對曰：「太后臨朝，淫虐無道，天下憤惋，共所棄之。公既身控神兵，心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謂非長策，深願三思。」⁷³

呂思勉先生據此認為尙朱榮早在入洛前就有誅殺百官的企圖，費穆不過是順著尙朱榮的心意提出建言。王延武先生與陳爽先生則依《魏書》，卷 19，〈元順傳〉所述：

尙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為陵戶鮮于康奴所害。⁷⁴

強化呂思勉先生的觀點。⁷⁵

但《北齊書》，卷 20，〈慕容紹宗傳〉的說法，並沒有排斥費穆首謀說，尙朱榮也有可能是在費穆獻策後，才徵求慕容紹宗的意見。其次，《魏書》在他處的記載也明白指出費穆為河陰之變的首謀，《魏書》，卷 74，〈尙朱榮傳〉說尙朱榮是「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說」；⁷⁶而常補《魏書》，卷 74，〈尙朱榮傳〉不足的《北史》，卷 48，〈尙朱榮傳〉亦稱：「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⁷⁷再者，費穆為河陰之變的首謀在當時是天下皆知之事。《魏書》，卷 44，〈費穆傳〉就說費穆之謀「天下聞之，莫不切齒。」後來費穆投降元顥，元顥也「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出而殺之。」⁷⁸

⁷² 魏收，《魏書》，卷 74，〈尙朱榮傳〉，頁 1648。

⁷³ 李百藥，《北齊書》，卷 20，〈慕容紹宗傳〉，頁 272。

⁷⁴ 魏收，《魏書》，卷 19，〈元順傳〉，頁 485。

⁷⁵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臺北：開明書店，1968），頁 573；王延武，〈北魏末的文化模式與尙朱榮的敗亡〉，頁 107；陳爽，〈河陰之變考論〉，頁 319-320。

⁷⁶ 魏收，《魏書》，卷 74，〈尙朱榮傳〉，頁 1647-1648。

⁷⁷ 李延壽，《北史》，卷 48，〈尙朱榮傳〉，頁 1753。

⁷⁸ 魏收，《魏書》，卷 44，〈費穆傳〉，頁 1005。

魏收在費穆傳後的〈史臣曰〉中，也說「費穆出身致力，遂有功名，而末路一言，禍被簪帶。校之文和，異世同咎。其死也幸哉！」⁷⁹最後，權威的編年史大著《資治通鑑》，亦將尒朱榮與慕容紹宗的談話列在費穆勸尒朱榮誅殺百官後。⁸⁰從而，本文便採費穆首謀說。

河陰之變前所未有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費穆為何向尒朱榮獻策誅殺百官呢？陳寅恪先生將之與六鎮之亂連繫在一起，認為費穆是站在禁軍反對漢化政策的立場，借尒朱榮之力以誅殺洛陽朝臣，然而如果細讀《魏書》，卷 44，〈費穆傳〉，陳先生所論猶有商榷餘地，《魏書》，卷 44，〈費穆傳〉載：

子穆，字朗興。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書史，好尚功名。……及六鎮反叛，詔穆為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崇乃請為朔州刺史，仍本將軍，尋改除雲州刺史。穆招離聚散，頗得人心。時北境州鎮，悉皆淪沒，唯穆獨據一城，四面抗拒。久之，援軍不至，兼行路阻塞，糧仗俱盡。穆知勢窮，乃棄城南走，投尒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二絳蜀反，以穆為都督，討平之。拜前將軍、散騎常侍，遷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妖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率眾討擊，破於關口之南。遷金紫光祿大夫，正武衛將軍。……榮入洛，穆遷中軍將軍、吏部尚書，魯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又領夏州大中正。⁸¹

費穆原先與李崇一起鎮壓六鎮之亂，並獨自堅守雲州，直到苦等援軍不至才被迫撤退。如果費穆與六鎮鎮民有一致的政治訴求，早應投降，但他卻堅守到底，可見費穆與六鎮鎮民不但不同類，更是彼此的敵人。且，費穆雖在討平二絳蜀亂後被提拔為前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似乎只是加官，《北史》，卷 50，〈費穆傳〉與《資治通鑑》就把前將軍給刪去，只留散騎常侍一職。⁸²梁武帝北伐，北魏朝廷派費穆率軍抵擋梁將韋放的進攻，費穆突襲韋放軍，因韋放力戰而撤退，⁸³之後便被任命為專職南方軍事的平南將軍、

⁷⁹ 魏收，《魏書》，卷 44，〈費穆傳〉，頁 1006。

⁸⁰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52，頁 4742。

⁸¹ 魏收，《魏書》，卷 44，〈費穆傳〉，頁 1003-1005。

⁸² 李廷壽，《北史》，卷 50，〈費穆傳〉，頁 1837。

⁸³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51，頁 4727。

光祿大夫。到了李洪亂起，費穆被任命為兼武衛將軍前去討伐，亂平後才升任正武衛將軍，據窪添慶文先生的研究，此乃實際的職務。⁸⁴李洪亂起的時間，《資治通鑑》繫之於梁武帝大通二年二月，⁸⁵而河陰之變發生於同年的四月，短短兩個月的經歷似乎甚難讓費穆成為禁軍的代表。

即使將費穆視為禁軍代表，大殺朝臣亦不符禁軍利益，因大亂時兩者實為一體，無法分割。河陰變後「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⁸⁶、「直衛空虛，官守廢曠。」⁸⁷可知，不僅朝臣，連禁軍也死傷逃散殆盡。河陰變後兩個月，孝莊帝「詔直寢紀業持節募新免牧戶，有投名效力者授九品官。」⁸⁸「直寢」一職，據張金龍先生的考證，是禁衛中「直衛」諸職之一，地位次於直閣將軍。⁸⁹孝莊帝要以超授為條件向新免牧戶招募禁軍，禁軍在河陰之變中受創之深，亦可想而知。再者，禁軍也缺乏屠殺朝臣的動機。禁軍雖與六鎮鎮民皆出身「豐沛舊門」，卻不同六鎮鎮民「征鎮驅使，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為清途所隔」；⁹⁰而是「各各榮顯」、⁹¹「得上品通官」，⁹²屬於統治階級的一環。更重要的是，禁軍在發動反對張仲瑀「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⁹³的暴動後，北魏朝廷不但不追究，⁹⁴反而答應禁軍的要求「令武官得依資入選。」⁹⁵禁軍保住了原有權益，⁹⁶對朝廷的不滿自應消滅，何況北魏朝廷即是禁軍利益之所繫，禁軍又何須與地位懸殊

⁸⁴ 窪添慶文，《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頁133。

⁸⁵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2，頁4736。

⁸⁶ 李延壽，《北史》，卷48，〈尙朱榮傳〉，頁1754。

⁸⁷ 李延壽，《北史》，卷48，〈尙朱榮傳〉，頁1755。

⁸⁸ 魏收，《魏書》，卷10，〈孝莊紀〉，頁259。

⁸⁹ 張金龍，〈北魏後期的直閣將軍與「直衛」諸職〉，《文史哲》，第1期(濟南，1999.01)，頁38-39。

⁹⁰ 魏收，《魏書》，卷18，〈元淵傳〉，頁430。

⁹¹ 李百藥，《北齊書》，卷23，〈魏蘭根傳〉，頁330。

⁹² 魏收，《魏書》，卷64，〈張彝傳〉，頁1432。

⁹³ 魏收，《魏書》，卷18，〈元淵傳〉，頁430。

⁹⁴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0。

⁹⁵ 魏收，《魏書》，卷66，〈崔亮傳〉，頁1479。

⁹⁶ 唐長孺，《山居存稿》，頁37。

的六鎮鎮民站在同一陣線反對北魏朝廷？

費穆為禁軍而獻策的可能性不大，那麼又為何要除去洛陽朝臣？費穆勸爾朱榮誅殺百官時，明白指出目的是「更樹親黨」，以徹底控制洛陽，而費穆個人正是爾朱榮的「親黨」之一。河陰之變後洛陽「百官蕩盡」，⁹⁷爾朱榮才能「樹置腹心在列職」，⁹⁸使得「起家暴貴者，不可勝數。」⁹⁹費穆雖不是「起家暴貴者」，但他絕對是河陰變後「暴貴者」的其中一人。費穆河陰變前的官位是「金紫光祿大夫，正武衛將軍。」河陰變後卻躍升為「中軍將軍、吏部尚書，魯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又領夏州大中正。」¹⁰⁰費穆為人「好尚功名」，如果沒有爆發河陰之變，在當時，像費穆這般武人出身者是很難擔任吏部尚書如此清要官職的。從而費穆獻策的原因也逐漸清晰，乃是藉大規模的殺戮手段，創造功成名就的契機。

三、爾朱榮的「河陰之愧」

被費穆所利用的爾朱榮原無篡位之心，卻以為只要兵權在手便能取元氏而代之。他令朝臣做禪文者免死，並把孝莊帝移到營幕中準備行篡位之事。此時爾朱榮「鑄金為己像，數四不成。」而劉靈助又在旁適時提點，爾朱榮才覺悟已犯下滔天大罪，急忙向孝莊帝叩頭請罪。¹⁰¹然而惡名已成，此後河陰之變便成為他內心揮之不去的陰影，甚至還產生了愧疚感。《北史》，卷 48，〈爾朱榮傳〉載：

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既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為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汎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戌，

⁹⁷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52，頁 4744。

⁹⁸ 李延壽，《北史》，卷 48，〈爾朱榮傳〉，頁 1755。

⁹⁹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52，頁 4745。

¹⁰⁰ 窪添慶文，《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頁 132-133。

¹⁰¹ 李延壽，《北史》，卷 48，〈爾朱榮傳〉，頁 1754；李延壽，《北史》，卷 5，〈孝莊紀〉，頁 161-162。

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¹⁰²

久歷沙場的爾朱榮早應習慣殺戮生活，何況在河陰之變中也只殺了二千餘人，對視人命如草芥的爾朱榮來說應該不是太大的數目，但他卻為此望孝莊帝馬首請死，甚為奇特。爾朱榮遲遲不敢入洛也無法解釋。因為，經過河陰的屠殺，已沒有任何勢力能與之抗衡，連皇帝的身邊也只有故舊數人陪伴，可說爾朱榮此時已經完全掌握了洛陽。照常理他應該是耀武揚威地帶領大軍入洛陽宣示功業，可是，爾朱榮手下的三千騎兵因犯下如此大案而不敢進入洛陽，他本人也遲遲不敢奉駕還都。即使勉強到了芒山，當他看到洛陽壯麗的城郭後卻又感到恐懼，竟然不敢再前進一步，即使武衛將軍汎禮一直苦勸也不聽。陳爽先生認為爾朱榮對入洛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遲疑，是因「河陰屠殺違背了爾朱榮與孝莊帝事前所達成的默契，突破了眾多禁軍將領心理底線，河陰之變前苦心孤詣數年建立起來的政治同盟面臨崩潰的邊緣。」此後還是在「得到了洛陽禁軍將領的明確表態後方敢進入洛陽的。」¹⁰³然而，陳爽先生似乎高估了禁軍當時的力量，如前述所言，河陰變後大部分的禁軍皆死散殆盡，對爾朱榮已不成威脅。此外，從「武衛將軍汎禮苦執不聽」，亦可知爾朱榮的意志並非禁軍將領所能左右。因此，如果不從史文爾朱榮對河陰之變感到愧悔的角度來審視，便很難解釋他此時的異常舉止。

爾朱榮雖然勉強率軍入城，可是同時也向皇帝再次提起遷都之事，似乎在洛陽多待一刻都不自在，還為此與朝臣起了衝突，《北史》，卷 19，〈元謐傳〉載：

爾朱榮之入洛陽，啟莊帝欲遷都晉陽。帝以問謐，爭之以為不可。榮怒曰：「何關君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謐曰：「天下事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謐！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謐。其從弟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謐顏色自若。後數

¹⁰² 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榮傳〉，頁1754。

¹⁰³ 陳爽，〈河陰之變考論〉，頁326。

日，帝與榮見宮闈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一昨愚志，有遷京之意，今見皇居壯觀，亦何用去河洛而就晉陽。臣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是以遷都議因罷。¹⁰⁴

能否以此認定爾朱榮對河陰之變的懊悔只是表面的呢？似乎不能如此解釋。元謐堅決反對遷都激怒了爾朱榮，讓他在大怒之下以河陰之變為例，威脅要殺了元謐。幾天後，也與河陰之變時的悔悟相同，當爾朱榮看到洛陽「宮闈壯麗，列樹成行」，就領悟到是自己的堅持是錯的，便向孝莊帝承認元謐說得對，不再提遷都之事。且爾朱榮會堅持非遷都不可，如上述所言，正是河陰之變所致。他在河陰變後對高歡、司馬子如說：「愆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給皇帝上表時也說：「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¹⁰⁵上表的話或許可以造假，跟部下高歡、司馬子如所說的話，應與內想法差距不大。更重要的是，遷都未成後，爾朱榮的某些舉動彷彿是要彌補河陰之變的罪過，他首先積極拉近與孝莊帝的關係，《北史》，卷 48，〈爾朱榮傳〉載：

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輞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明帝嬪，欲上立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羸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悅。¹⁰⁶

從孝莊帝發誓相信爾朱榮無二心、以爾朱榮女為后，「榮喜」、「榮意甚悅」的反應來看，爾朱榮亟欲改善與孝莊帝關係的意圖相當明顯。此外，對河陰之變無辜犧牲的朝臣，爾朱榮也請求超升他們的官爵，「使恩治存亡，有慰生死」；接著更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治，經綸王道，以為常式。」引見三公、令僕等人商討國家大事可以理解，但令人深感突兀的是爾朱榮為何在奏文中提及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呢？河陰地方的官員與國家大計應無

¹⁰⁴ 李延壽，《北史》，卷 19，〈元謐傳〉，頁 696。

¹⁰⁵ 魏收，《魏書》，卷 74，〈爾朱榮傳〉，頁 1648-1649。

¹⁰⁶ 李延壽，《北史》，卷 48，〈爾朱榮傳〉，頁 1754-1755。

太大關係，尙朱榮或許仍對河陰慘案念念不忘，才會把河陰地方的長官提升到如此高的位階，使他們能夠與三公、令僕等人議論政事。¹⁰⁷

尙朱榮此後便主動請膺不斷地南征北討，¹⁰⁸在討平葛榮後，還因是否讓孝莊帝親見葛榮引發一場小風波，《魏書》，卷 60，〈韓子熙傳〉載：

尙朱榮之擒葛榮也，送至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為(葛)榮既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尙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¹⁰⁹

可知，尙朱榮極想在孝莊帝面前展現自己的功績。

尙朱榮的用心，孝莊帝與洛陽朝臣也都能感受得到。當元顥在梁朝的支援下即將攻入洛陽，有人勸孝莊帝前去關中避難，高道穆卻建議：

「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元顥兵眾不多，乘虛深入者，由國家將帥征捍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如恐成敗難測，非萬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合於滎陽，向虎牢；別徵尙朱王軍，令赴河內以掎角之。旬月之間，何往不克。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¹¹⁰

值得注意的是，高道穆向孝莊帝提議召元天穆、尙朱榮等人前來救駕，還說這是「萬全之計」。但，此時河陰餘悸尚存，又是皇室最脆弱的時候，尙朱榮如果還想篡位，高道穆的建議不啻正中其下懷。可知，在高道穆的認知中尙朱榮乃忠於朝廷。而孝莊帝不採入關之策，轉而召尙朱榮來會，也表示他對尙朱榮縱有疑慮，可是在看到尙朱榮的積極表現後，對他的觀點也有所轉變，至少相信尙朱榮不會趁機重蹈河陰之事。

當尙朱榮在收到詔書後立即與孝莊帝相會，準備反攻洛陽，卻因錯過夏州義士響應的良機，讓尙朱榮為之「悵然失望」想先回晉陽，等待秋天再行進攻。¹¹¹楊侃勸他：

¹⁰⁷ 李延壽，《北史》，卷48，〈尙朱榮傳〉，頁1755。

¹⁰⁸ 李延壽，《北史》，卷48，〈尙朱榮傳〉，頁1749。

¹⁰⁹ 魏收，《魏書》，卷60，〈韓子熙傳〉，頁1337。

¹¹⁰ 魏收，《魏書》，卷77，〈高道穆傳〉，頁1715。

¹¹¹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3，頁4764。

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為欲廣申經略，寧復帝基乎？……若今即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一旦得渡，必立大功。¹¹²

高道穆也勸他：

元顥以蕞爾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飄露，人神恨憤，主憂臣辱，良在於今。大王擁百萬之眾，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船，處處遣渡，徑擒群賊，復主宮闈，此桓文之舉也。¹¹³

有趣的是，日後楊侃在孝莊帝暗殺爾朱榮的行動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¹¹⁴高道穆則是極力抗拒爾朱榮對於御史人選的干預，¹¹⁵但他們此時卻都對爾朱榮期望備至。而且，他們的觀點與高歡、賀拔岳等人勸爾朱榮入京剷除胡太后專政時所抱持的想法並無二致，都是希望爾朱榮能夠把握機會輔助皇室以成就「桓文之業」。¹¹⁶可見，爾朱榮的努力的確改變了皇帝及洛陽朝臣對他的看法。

即使立下了無比的功勳，爾朱榮仍不甚滿意，《魏書》，卷 74，〈爾朱榮傳〉載：

榮性好獵，不捨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險阻，不得迴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北史》，卷 48，〈爾朱榮傳〉作：「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即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為樂焉。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

¹¹² 魏收，《魏書》，卷 58，〈楊侃傳〉，頁 1283。

¹¹³ 魏收，《魏書》，卷 77，〈高道穆傳〉，頁 1715。

¹¹⁴ 魏收，《魏書》，卷 58，〈楊侃傳〉，頁 1284。

¹¹⁵ 魏收，《魏書》，卷 77，〈高道穆傳〉，頁 1715-1716。

¹¹⁶ 李延壽，《北史》，卷 6，〈齊神武紀〉，頁 211；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點校本)，卷 14，〈賀拔岳傳〉，頁 221。

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污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荊，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方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¹¹⁷

元天穆是尒朱榮的異姓兄弟，也是他起兵時的智囊，最後更同被孝莊帝所殺，尒朱榮對他說的話當出自真心。¹¹⁸ 尔朱榮會有如此遠大的志向，應與他在河陰所犯下的大錯有相當關係；如前引《北史》，卷48，〈尒朱榮傳〉所言，雖然孝莊帝發誓相信尒朱榮無二心，並答應與之聯姻，但從他欲趁機殺了尒朱榮與遲遲不能決定聯姻一事來看，孝莊帝對尒朱榮的心結已深，無法以宣誓效忠及聯姻的方式來化解。尒朱榮對此也是心知肚明的(自此不復禁中宿矣)，因此，他是不是只有立下不世功勳才能使世人與孝莊帝逐漸忘去他在河陰所犯下的天大過錯呢？如果這樣的推論沒有太大的差錯，我們也許能對尒朱榮不滿於既有成就，不斷藉狩獵訓練士兵，為一統華夏作準備的心態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尒朱榮為北魏四處平亂的成就顯而易見，魏收是這樣評價他的：

尒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眾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頽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啟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寶夤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

¹¹⁷ 魏收，《魏書》，卷74，〈尒朱榮傳〉，頁1653-1654；李延壽，《北史》，卷48，〈尒朱榮傳〉，頁1758。

¹¹⁸ 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1，「永寧寺」條，頁30；李延壽，《北史》，卷48，〈尒朱榮傳〉，頁1753、1761。據魏收，《魏書》，卷74，〈尒朱榮傳〉，頁1654，孝莊帝更因元天穆在外，而不敢殺尒朱榮，亦可見其地位。

苟非榮之致力，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¹¹⁹

魏收所論，孝莊帝也是認同的。他在誅殺爾朱榮後所下的詔書中說：

頃孝昌之末，天步孔艱，女主亂政，監國無主。爾朱榮爰自晉陽，同憂王室，義旗之建，大會盟津，與世樂推，共成鴻業。論其始圖，非無勞效。但致遠恐泥，終之實難，曾未崇朝，豺聲已露。河陰之役，安忍無親。王公卿士，一朝塗地，宗戚靡遺，內外俱盡。假弄天威，殆危神器。時事倉卒，未遑問罪。尋以葛賊橫行，馬首南向，捨過責成，用平醜虜。及元顥問鼎，大駕北巡，復致勤王，展力行所。以此論功，且可補過。¹²⁰

此時爾朱榮已死，孝莊帝再無顧忌，所下的詔令當是反映內心所想，¹²¹他卻是以「以此論功，且可補過」來總結爾朱榮的一生。「功」，據孝莊帝所言，是擒葛榮與誅元顥，而「過」正是河陰之變。爾朱榮到最後總算將功補過了，但仍被孝莊帝所殺，可見當有其他因素，讓他身首異處。

四、「河陰之愧」與爾朱榮之死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爾朱榮的性格。《魏書》，卷 74，〈爾朱榮傳〉說他年紀很小的時候就「神明機決」，¹²²可是，當孝莊帝要殺他的風聲已經遍佈天下時，爾朱榮仍然輕視孝莊帝，認為他必定無膽動手。加上，孝莊帝以一言就能鬆懈他的心房，可以想見爾朱榮性格之單純。¹²³爾朱榮也是一個殘酷的人，《北史》，卷 48，〈爾朱榮傳〉說他：「性甚嚴暴，懲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於手，每有瞋嫌，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¹²⁴可知，胡人粗獷、殘暴、好殺的特點在爾朱榮身上表露無遺。且天下是因爾朱榮才

¹¹⁹ 魏收，《魏書》，卷 74，〈爾朱榮傳〉，頁 1657。

¹²⁰ 魏收，《魏書》，卷 10，〈孝莊紀〉，頁 265。

¹²¹ 陳爽先生認為，孝莊帝會如此肯定爾朱榮，亦有全面否定爾朱榮便意味著否定其自身法統性的考量。參陳爽，〈河陰之變考論〉，頁 331-332。

¹²² 魏收，《魏書》，卷 74，〈爾朱榮傳〉，頁 1648。

¹²³ 李延壽，《北史》，卷 48，〈爾朱榮傳〉，頁 1757。

¹²⁴ 李延壽，《北史》，卷 48，〈爾朱榮傳〉，頁 1762。

得以回復太平，至高的成就讓他也為之醺醺然了，變得驕傲異常，《洛陽伽藍記》就說尒朱榮：「位極心驕，功高意侈。」¹²⁵因此，尒朱榮雖自覺在河陰犯下了天大的過錯，也要去彌補這個愧疚，可是，他卻是一個粗野沒有心機、性格單純、驕傲又殘酷異常的胡人，如果尒朱榮只是一名將領，這樣的性情也許是成就功業的助力，但當他爬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後，粗暴的個性卻讓原本就難以收拾的局面更加惡化。他雖然率先喊除革新政治的口號，但成為主政者之後卻不知如何把口號化成現實，反而粗野、蠻橫地想要掌握政權，這也讓他與孝莊帝的關係急速惡化。

欲全盤掌握政權的第一步，即是在朝中安插人馬，史稱其「遙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僚朝廷動靜，莫不以申。至於除授，皆須(尒朱)榮許，然後得用。」¹²⁶然而，尒朱榮亟欲掌握政權不單只是權力野心，也有現實考量。他會輕信費穆的計策大肆誅殺，除了害怕虛實被洛陽朝臣所看穿外，也是擔心自己的威望不夠，沒有親黨在洛陽坐鎮，不可知的變亂隨時會爆發。此外，尒朱榮對貪污成風的洛陽朝臣亦十分鄙視，從他與慕容紹宗的談話，可知尒朱榮會動念誅殺百官是因「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剪，恐難制馭。」¹²⁷在河陰，群臣的罪狀亦是「貪虐」。¹²⁸如果從尒朱榮的觀點來看，胡太后與洛陽朝臣等人同樣都是「驕侈成俗」的創造者與參與者，這正是尒朱榮所要剷除的一群人。呂思勉先生認為費穆向尒朱榮提議誅殺朝臣的計策，除了基於現實情勢的考慮外，也是刻意迎合尒朱榮不滿洛陽奢靡風氣的心態。¹²⁹尒朱榮對洛陽朝臣的厭惡感並未隨掌握政權而消減，死前不久與元天穆談論志向時便說：「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污朝貴入圍搏虎。」往後，他再次入洛前「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尒朱)

¹²⁵ 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1，「永寧寺」條，頁40。

¹²⁶ 李延壽，《北史》，卷48，〈尒朱榮傳〉，頁1757。

¹²⁷ 李百藥，《北齊書》，卷20，〈慕容紹宗傳〉，頁272。

¹²⁸ 魏收，《魏書》，卷74，〈尒朱榮傳〉，頁1648。

¹²⁹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頁573-574。費穆早在河陰之變前就與尒朱榮熟識，獻策能深得尒朱榮的心意，似乎也與此有關。

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留。」¹³⁰亦是此一心態的反射。況且唯有清除洛陽的舊朝臣勢力，他才能安插親爾朱氏的官員，才能一掃洛陽的靡靡之風。可是最終的關鍵仍在於孝莊帝，孝莊帝如不配合，爾朱榮也無法布置自己的人馬，於是對皇帝的掌控更形重要。

孝莊帝如果是不懂世事的幼君，當然可被爾朱榮所任意操縱。但，孝莊帝卻是爾朱榮打出反對胡太后立幼君的口號之下所擁立的長君，已有自己的意志，從而爾朱榮對孝莊帝施加的壓力也更大，《北史》，卷 48，〈爾朱榮傳〉載：

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神儁以階縣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魏書》，卷 39，〈李神儁傳〉後多「謂神儁自樹親黨，排抑勳人。」一句）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儁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啟北人為河內（南）諸州，欲為掎角勢，上不即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啟數人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嫌恨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日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兄止自不為，若本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既外迫強臣，內逼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為貴。¹³¹

即使受制於人，孝莊帝卻仍極思振作，屢屢駁回爾朱榮所提請的官員任命案。爾朱榮相當惱怒，口出惡言，爾朱皇后與爾朱世隆也對他冷嘲熱諷，都讓孝莊帝承受了極大的壓力。然而，這些事件對爾朱榮之死是否真有關係

¹³⁰ 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榮傳〉，頁1759。

¹³¹ 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榮傳〉，頁1757；魏收，《魏書》，卷39，〈李神儁傳〉，頁896。

鍵影響，似乎是應該再加以評估的。

因為，孝莊帝對誅殺爾朱榮始終猶豫不決，《北史》，卷 48，〈爾朱榮傳〉載：

榮見帝年長明悟，為眾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己。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暫來向京，言看皇后婉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彧、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刺殺之。惟濟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所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¹³²孝莊帝雖擔心河陰之事會重演，在群臣的建議下，開始傾向誅殺爾朱榮，然而，他還是懷疑再三，遲遲不能決定；之後，更無視大好良機，突然決定中止暗殺計畫，《魏書》，卷 74，〈爾朱榮傳〉載：

帝既圖榮，榮至入見，即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為後患，故隱忍未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¹³³（《北史》，卷 48，〈爾朱榮傳〉多「帝欲止，城陽王（元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¹³⁴一句。）

孝莊帝此時已麻痺爾朱榮的戒心，爾朱榮屢次進宮旁人不多，又皆不攜兵刃，正是下手的絕佳時機，積怨已久的孝莊帝理應即刻除掉心腹大患，弔詭的是，他卻突然決定停止暗殺行動。從元徽當下勸他：「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¹³⁵可知，孝莊帝會改變心意，是因看到爾朱榮屢屢輕裝簡從、卸除武裝入宮的作派，認為他並無反心。只要爾朱榮「猶存臣節」，縱使他「無君之跡，日月以甚」，¹³⁶孝莊帝還是能繼續忍耐。因此，應有其

¹³² 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榮傳〉，頁1759。

¹³³ 魏收，《魏書》，卷74，〈爾朱榮傳〉，頁1654-1655。

¹³⁴ 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榮傳〉，頁1759-1760。

¹³⁵ 此句，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4，頁4781，作「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不可保邪！」將「何」改成「不」，更凸顯元徽的疑惑。

¹³⁶ 魏收，《魏書》，卷10，〈孝莊紀〉，頁266，載孝莊帝誅爾朱榮詔書語。

他因素使孝莊帝最終下定誅除爾朱榮的決心。

爾朱榮進京前，雙方底下的人不耳語不斷，皆以爾朱榮入京是為篡位做準備，爾朱榮一些無心的言論也被解作謀反的徵兆，都讓孝莊帝誅殺爾朱榮的想法日益強烈，甚至為此還作了一個夢。¹³⁷但讓雙方衝突正式引爆的卻是遷都一事，對此，《北史》，卷48，〈爾朱榮傳〉載：

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資治通鑑》多「由是帝益疑之」一句）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上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況必不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洛陽伽藍記》作：「帝怒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¹³⁸）」

爾朱榮欲以狩獵為藉口挾持皇帝遷都的風聲，孝莊帝早就由奚毅的管道得知，可是當時他仍半信半疑，直到爾朱榮親口向他證實傳聞為真，更加懷疑爾朱榮要謀反，三天後孝莊帝就召中書舍人溫子昇詢問王允殺董卓的經過，顯然已下定決心。

周祖謨先生認為孝莊帝「不作漢獻帝生」之語，是不願受如曹操般強臣的壓迫。¹³⁹但從詢問王允誅董卓事可知，孝莊帝當是將爾朱榮比擬為董卓。孝莊帝不是隨便提起董卓的。董卓與爾朱榮皆是權臣；更重要的是，董卓也要遷都。此外，董卓與爾朱榮還有太多驚人的相似處：董卓「宗族內外，並居列位」，¹⁴⁰爾朱榮則「親戚腹心，皆補要職」；董卓「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¹⁴¹爾朱榮則「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

¹³⁷ 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榮傳〉，頁1759-1760。

¹³⁸ 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榮傳〉，頁1759-1760；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4，頁4782；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1，「永寧寺」條，頁40。

¹³⁹ 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1，「永寧寺」條，頁40。

¹⁴⁰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點校本），卷72，〈董卓列傳〉，頁2329。

¹⁴¹ 范曄，《後漢書》，卷72，〈董卓列傳〉，頁2329。

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¹⁴²董卓入洛「人情恐崩，不保朝夕」、¹⁴³余朱榮入洛則「迭相驚恐，人情駭震」，¹⁴⁴兩人一樣殘忍好殺、¹⁴⁵一樣殺了皇帝與太后(董卓：少帝與何太后、余朱榮：幼主與胡太后)、¹⁴⁶官位一樣都是太師、¹⁴⁷側近大臣同樣叛變(董卓：呂布、余朱榮：奚毅)。¹⁴⁸兩人既如此相似，孝莊帝同樣也能拿董卓遷都後的結果，來推測余朱榮遷都後的政局發展，對此，《後漢書》，卷72，〈董卓列傳〉載：

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天子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轄，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¹⁴⁹

董卓遷都前即有不臣之心，遷都後即不加遮掩，¹⁵⁰從他僭擬天子車服，可知董卓所說的「事」，便是移鼎之事，無怪乎孝莊帝在詔書中會直斥余朱榮：方復託名朝宗，陰圖釁逆，睥睨天居，窺覲聖曆。乃有裂冠毀冕之

¹⁴² 李延壽，《北史》，卷48，〈余朱榮傳〉，頁1762。

¹⁴³ 范曄，《後漢書》，卷72，〈董卓列傳〉，頁2325。

¹⁴⁴ 李延壽，《北史》，卷48，〈余朱榮傳〉，頁1755。

¹⁴⁵ 范曄，《後漢書》，卷72，〈董卓列傳〉，頁2330。

¹⁴⁶ 范曄，《後漢書》，卷72，〈董卓列傳〉，頁2324；范曄，《後漢書》，卷9，〈孝獻帝紀〉，頁369。

¹⁴⁷ 魏收，《魏書》，卷74，〈余朱榮傳〉，頁1651。

¹⁴⁸ 范曄，《後漢書》，卷72，〈董卓列傳〉，頁2331；李延壽，《北史》，卷48，〈余朱榮傳〉，頁1760。

¹⁴⁹ 范曄，《後漢書》，卷72，〈董卓列傳〉，頁2328-2329。

¹⁵⁰ 董卓早在入洛後不久便顯示出欲自立的意圖，范曄，《後漢書》，卷74上，〈袁紹列傳〉，頁2374：「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案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又司馬光，《資治通鑑》，卷59，頁1903，胡三省註曰：「且爾，猶言如此也。卓意欲廢漢自立。」

心，將為拔本塞源之事。……將而必誅，罪無容捨。¹⁵¹

因為，在孝莊帝的眼中，爾朱榮便是當今董卓；遷都一事，即是爾朱榮效法董卓圖謀篡位的確證，這正是他最擔心的事。爾朱榮要他當名實不符的虛君，已然逼近忍耐的極限，何況要把皇位拱手讓人？孝莊帝決意不當被董卓脅持遷都苟延殘喘的漢獻帝(不作漢獻帝生)，便問溫子昇王允誅董卓事，並從中吸取王允失敗的教訓，認為只要誅殺爾朱榮後，立刻大赦其黨，即能成功；於是孝莊帝才會自信滿滿認定此事必定萬無一失(況必不死)，決心致爾朱榮於死地。

遷都之事異常敏感，孝莊帝聯想到董卓前鑑，效法王允前例誅殺爾朱榮。但，爾朱榮遷都的考量正如前述，欲把皇帝移到距離晉陽近一點的代以方便控制，相反的，孝莊帝的聯想卻於史無徵；雖然人的想法很難推測，但我們是還能找出一些旁證，間接論證爾朱榮並無謀反的意圖。

首先，即使孝莊帝欲暗殺爾朱榮的風聲已然天下皆知，但在孝莊帝保證此乃流言後，爾朱榮便卻除疑心，每次入宮觀見孝莊帝，身邊僅有數十人隨從且全不攜兵器，如此才讓孝莊帝有可趁之機。《北史》，卷 48，〈爾朱榮傳〉載：

(孝莊帝)乃伏(楊)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力從東戶入，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¹⁵²

爾朱榮因輕視皇帝，最後一次入宮時仍認定孝莊帝不敢對自己動手，¹⁵³從

¹⁵¹ 魏收，《魏書》，卷10，〈孝莊紀〉，頁266。

¹⁵² 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榮傳〉，頁1761。

¹⁵³ 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世隆傳〉，頁1770。

而身旁侍衛只有區區二、三十人。¹⁵⁴而我們從楊侃前次欲誅殺爾朱榮時僅招集了十餘人以為己助，亦可推想魯安等人的人數應該也不多，但這群人皆攜帶兵刃。爾朱榮身邊侍衛人數本少，又無兵器，便非敵手，所以爾朱榮才會撲向孝莊帝，因他意識到這是保命唯一的機會。如果爾朱榮早有謀反之意，縱使輕視皇帝，也不會毫無戒心，¹⁵⁵相反的，入宮時更應率領龐大的武裝隨從嚴加戒備，¹⁵⁶一則可預防對方退無可退時的搏命反撲，一則可震懾皇帝與群臣以化解篡位的阻力，高洋篡東魏時便以此為前導。¹⁵⁷孝莊帝此前中止暗殺計畫，也是因爾朱榮輕裝簡從、不攜兵刃入宮之故。且爾朱榮最後一次入宮的目的是大舉「革易」人事，孝莊帝誅殺爾朱榮後「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啟，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盡在出限。」¹⁵⁸焦點亦是在強化對皇帝的控制，並不見謀叛意圖。

其次，鑄金人為己像以卜測天命所歸乃是北俗故事，¹⁵⁹往後，高洋欲移魏鼎前也先「鑄象以卜之，一寫而成」才行禪讓之事，¹⁶⁰可見鑄像一事是篡位的明確證據。爾朱榮極為迷信，¹⁶¹他在河陰想篡位時也曾「鑄金為己像」等到「數四不成」後才及時醒悟，向孝莊帝匍匐謝罪，但，到他死前都沒有發現到有鑄金人的紀錄，亦可見其無篡位之心。

再者，孝莊帝雖將爾朱榮聯想成董卓，但董卓車服僭擬天子，爾朱榮卻沒有；董卓的志向是要移漢鼎而代之，爾朱榮一生最大的志業，卻是在死前不久跟元天穆說的：「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

¹⁵⁴ 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1，「永寧寺」條，頁41；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4，頁4783。

¹⁵⁵ 尔朱榮雖然性格單純，卻非遲鈍之人。前述當察覺孝莊帝要趁機殺他後，從此便不敢留宿在宮中，即是一證。

¹⁵⁶ 尔朱榮入洛時所帶的騎兵就高達四五千騎，若全數用來侍衛也絕非問題，見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榮傳〉，頁1759。

¹⁵⁷ 李延壽，《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258。另，高洋篡位遇到重重阻力，筆者認為這與當時「人心思魏」的強烈氛圍有關，詳細討論請參胡勝源，〈「人心思魏」與魏齊禪代〉，《臺大歷史學報》，第42期(臺北，2008.12)，頁18-40。

¹⁵⁸ 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榮傳〉，頁1761。

¹⁵⁹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卷14，「後魏以鑄像卜休咎」條，頁301。

¹⁶⁰ 李延壽，《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258。

¹⁶¹ 魏收，《魏書》，卷91，〈劉靈助傳〉，頁1958。

方，觀風俗，布政教。」¹⁶²即便他渴望殊賞、¹⁶³大權獨攬，更「欲移(孝莊帝)自近，皆使由己」，但「奉天子」的根本目標至死都沒變，¹⁶⁴可見尒朱榮安於臣位的心態。而元天穆勸尒朱榮：「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資治通鑑》將「勳濟天下」改為「勳業已盛」，可見劉恕認為元天穆有勸尒朱榮韜光養晦的意思。¹⁶⁵對比元天穆在河陰變前勸尒朱榮效法伊尹、霍光行廢立之事的言論，¹⁶⁶可知生死與共的心腹兄弟元天穆此時也不認為尒朱榮要行非常之事。

最後，我們從尒朱榮死後，尒朱世隆的反應似乎也能看出尒朱榮無謀反的跡象。《資治通鑑》載：「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謂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為太原王報讐，終無降理！』」¹⁶⁷尒朱榮如確因欲謀反而被孝莊帝所殺，其從弟尒朱世隆應不至於如此憤恨，¹⁶⁸且緊咬孝莊帝不守信誓做為報仇的理由，亦可觀其態度。雖然他的立場並不客觀，然而結合上述的諸多旁證，對照所有相關記載後，並沒有找到尒朱榮欲反的確切證據，從而，尒朱榮無謀反之心的可能性似乎比較大。¹⁶⁹

¹⁶² 魏收，《魏書》，卷74，〈尒朱榮傳〉，頁1654。

¹⁶³ 李延壽，《北史》，卷48，〈尒朱榮傳〉，頁1759。

¹⁶⁴ 長部悅弘，〈北魏孝莊帝代爾朱氏軍閥集團再論(3)王都——霸府体制を焦点にして〉，《琉球大學地理歷史人類學論集》，第1期(沖繩，2010.03)，頁25。

¹⁶⁵ 魏收，《魏書》，卷74，〈尒朱榮傳〉，頁1653；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4，頁4778-4779。

¹⁶⁶ 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1，「永寧寺」條，頁30。

¹⁶⁷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4，頁4785-4786。

¹⁶⁸ 魏收，《魏書》，卷75，〈尒朱世隆傳〉，頁1688。

¹⁶⁹ 高歡曾指責尒朱榮欲篡位。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6：「尒朱兆責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効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兩軍交戰前，雙方在言語上互相攻擊，內容雖有實事，但大多是捏造的，意欲揚己方威風，挫敵方銳氣。高歡就有勸尒朱榮篡位與不要篡位兩種史料並陳，筆者曾比對《周書》、《魏書》與《北史》的記載，認為高歡勸尒朱榮篡位一事當源自西魏討伐高歡的檄文，其中也將許多尒朱氏的暴行歸於高歡，並非事實。從而，在此高歡指責尒朱榮欲行篡位一事，也可歸為同類，可信度並不高。詳細的考證請參胡勝源，〈東魏北齊的政治與文化問題新探〉(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22-23。

爾朱榮與董卓雖頗多類似之處，但爾朱榮畢竟不是董卓，他雖犯下河陰屠殺的大錯，卻也用紮實的功績挽救了北魏政權，才得到孝莊帝「以此論功，且可補過」的評語。爾朱榮一往直前勇於平亂，但孝莊帝的帝王心術卻不是性格單純的他所能參透，《北史》，卷 48，〈爾朱榮傳〉載：

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深(淵)討斬之。時
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幽、涇，榮遣其從子天光為雍州刺史，令率
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關討之。……禽醜奴、寶夤，並檻車送
闕。天光又禽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
莊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為逆，當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
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或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
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
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¹⁷⁰

河陰之變的陰影，讓孝莊帝始終對爾朱榮放心不下。天下雖然大亂，孝莊帝卻不擔心，因爾朱榮主動請膺征討亂事，雙方若僵持不下，他正可坐收漁翁之利。出乎意料地，爾朱榮迅速平定諸多動亂，孝莊帝雖為此不悅，但仍不得不給他越來越多封賞；之前爾朱榮奉孝莊帝為帝，孝莊帝就封他「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食邑二萬戶、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平定葛榮後則封他「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增邑一萬戶，通前三萬。……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為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誅殺元顥後，更封他為「天柱大將軍」，還說：

此官雖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以前增置此號，式遵典故，用錫
殊禮。……可增封十萬，通前二十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¹⁷¹

胡三省注：「天柱，前無此號，魏主以爾朱榮功高，特置以寵之。」¹⁷²孝莊帝要特意創出「訪古無聞，今員未有」的天柱大將軍稱號才配得上爾朱榮

¹⁷⁰ 李廷壽，《北史》，卷48，〈爾朱榮傳〉，頁1757-1758。

¹⁷¹ 魏收，《魏書》，卷74，〈爾朱榮傳〉，頁1647-1653。

¹⁷²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3，頁4766。

的功績，可見在孝莊帝的心中，爾朱榮的功業到逐元顥時已臻顛峰；但爾朱榮的勳業不止於此，他後來還立下擒韓樓、萬俟醜奴、蕭寶寅的功勞，從而，天下太平後，爾朱榮就跟孝莊帝要更高的賞賜，《北史》，卷 48，〈爾朱榮傳〉載：

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此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¹⁷³

為什麼孝莊帝不願賜爾朱榮九錫呢？因為九錫乃是皇帝賜與人臣的最高封賞。在北魏，本為人臣而獲贈九錫殊禮的只有宗室元澄一人，那還是胡太后在他死後賜的。¹⁷⁴如果爾朱榮以異姓的身份在生前得到九錫，那將會是北魏歷史上第一人，這也意味著爾朱榮往後若再立下大功，孝莊帝的地位便岌岌可危。孝莊帝之前硬是創了天柱大將軍的稱號當作殊禮賞給爾朱榮，很可能就是不願賜與九錫心態所使然。

爾朱榮沒要到九錫，接著就提議遷都。¹⁷⁵即使在此時，孝莊帝對誅殺爾朱榮一事卻仍猶豫不決，更一度決定終止暗殺計畫。可以說，孝莊帝的心意在爾朱榮「無謀反之心」與「無君之跡」間不斷擺盪。孝莊帝最終不再猶豫，下定決心暗殺爾朱榮，如上述所言，是因遷都一事被認定是爾朱榮圖謀篡位的明確證據，但魏收還指出深層的原因，他在〈孝莊紀〉後的〈史臣曰〉中說：

莊帝潛思變化，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猾逆既翦，權強擅命，抑是兆謀運智之秋，勞謙夕惕之日也。未聞長讐之策，遽深貞刺之恐，謀謨罕術，授任乖方，猜嫌行戮，禍不旋踵。¹⁷⁶

遭孝莊帝猜嫌乃是爾朱榮身死的關鍵，那麼爾朱榮被「猜嫌」的原因是什麼？魏收在〈爾朱榮傳〉後的〈史臣曰〉裡說：

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崩通致說於韓王也。¹⁷⁷

¹⁷³ 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榮傳〉，頁1759。

¹⁷⁴ 魏收，《魏書》，卷19中，〈元澄傳〉，頁480。

¹⁷⁵ 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榮傳〉，頁1759。

¹⁷⁶ 魏收，《魏書》，卷10，〈孝莊紀〉，頁268-269。

¹⁷⁷ 魏收，《魏書》，卷74，〈爾朱榮傳〉，頁1657。

可知線索在蒯通勸說韓信的一番話，對此，《史記》，卷 92，〈淮陰侯列傳〉載：

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¹⁷⁸

蒯通以為韓信所立下的功業已經超越臣下所能達到的顛峰，甚至凌駕君王，這是人臣大忌。孝莊帝在詔書中指責尒朱榮：「既見金革稍寧、方隅漸泰，不推天功，專為己力。」¹⁷⁹節閔帝元恭講得更明白：「太原王(尒朱榮)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罪亦合死。」¹⁸⁰「天功」或「天之功」，便是蒯通所謂的「不賞之功」。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尒朱榮的例子，他與韓信極為相似，都因立下「不賞之功」而「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即便尒朱榮與韓信般確無反心，但他平定內亂、屢戰屢勝的天大功勳與河陰之變的往事，皆讓孝莊帝確信遷都乃尒朱榮意圖謀反的前兆(負刺之恐)，從而，在尒朱榮親口證實遷都計畫後，孝莊帝長年積累的不滿，再也無法克制地一次爆發，尒朱榮也走上生命的末路。詭異的是尒朱榮所以會「功無二於天下」，如果前述論證不誤，正是源自欲建立不世勳業以洗刷河陰往事的心態上，他越幫朝廷平定一個亂事，就越向死亡深淵更邁進一步，如此二律背反的現象不只是尒朱榮的悲劇也是孝莊帝的悲劇。

五、河陰之變的性質與影響

從前述分析來看，河陰之變的性質似與六鎮之亂不同。因，尒朱榮並非依仗龐大的軍隊進而衝破胡太后所佈下的層層防禦，相反的，他率領不

¹⁷⁸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點校本)，卷92，〈淮陰侯列傳〉，頁1653-1654。

¹⁷⁹ 魏收，《魏書》，卷10，〈孝莊紀〉，頁265。

¹⁸⁰ 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2，「平等寺」條，頁101。

到萬人的部眾兵不血刃地就到了洛陽近郊。所以能如此輕而易舉，關鍵在他首先喊出立長君、賢君的口號，擁立了孝文帝的從子元子攸為帝而深得人心。此外，他會因犯下河陰之變而愧悔不已，進而叩頭請死；還說出「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這樣的話，可見爾朱榮受漢文化的影響應不如以往認知的那般微小。

再者，據唐長孺先生的研究，爾朱榮與北魏皇室關係非同一般，不僅是參與北魏政權運作最高級的部落貴族，六鎮起兵後更是鎮民最兇惡的敵人。¹⁸¹唐先生以為：

決不是全部胡人都參加了鬥爭行列，胡人中居於統治地位的酋豪們除了個別以外，或者是像爾朱榮那樣自始至終堅決以血腥鎮壓為己任的反動頭子，或者猶豫動搖，終於叛變投降，……酋豪中像爾朱榮這樣的人也是不多的。他不僅是一般的領民酋長，而且他自己是南安王元楨的女婿，他的女兒是肅宗(孝明帝)妃嬪，和皇室有特殊關係。他的身分決定他的反動活動。¹⁸²

而這樣的反動活動(即堅決血腥鎮壓六鎮之亂)，唐先生認為代表爾朱榮站在階級矛盾的立場而「擁魏」。¹⁸³

唐長孺先生將爾朱榮與六鎮下層鎮民置於極端對立的關係上，所論誠是；但，唐先生把六鎮豪強與爾朱榮混為一談並不正確，¹⁸⁴因兩者並不屬於同一類人。爾朱榮雖然不吝提拔高歡、賀拔岳等為數眾多的六鎮豪強，爾朱榮真正親信的卻仍是爾朱氏一族。爾朱榮在討伐葛榮或後來征討元顥

¹⁸¹ 唐長孺，《山居存稿》，頁76-77。

¹⁸² 唐長孺，《山居存稿》，頁90-91。

¹⁸³ 唐長孺，《山居存稿》，頁80：「階級矛盾是對抗性的，哪怕當時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族內的階級矛盾也還是不可調和，鬥爭也遠不是停止，只不過通常以反魏與擁魏的面貌出現。」「擁魏」一詞，長部悅弘先生名之為「尊皇意識」，請參長部悅弘，〈北魏孝莊帝代爾朱氏軍閥集團再論(3)王都——霸府体制を焦点にして〉，頁24-25。

¹⁸⁴ 唐長孺，《山居存稿》，頁59-60：「北鎮豪強和洛陽朝貴間的矛盾也是十分尖銳。儘管他們鎮壓起義十分賣力，他們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洛陽朝貴對這些人仍然歧視和疑忌，連同情他們的元淵也是被猜疑的人。所以這次殺戮出於爾朱榮之手，正反映了北鎮豪強對洛陽漢族與鮮卑門閥政權的積憤。」唐先生上述論點沿承陳寅恪先生，對此，本文意見稍有不同，請參前論。

時，都留從祖兄子尒朱天光在并州以「鎮其根本」，還對他說「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對尒朱天光要求也最嚴格，他在征討万俟醜奴時停留未進，尒朱榮就杖他百下；不能擒獲万俟道洛，再杖百下，並削爵為侯。¹⁸⁵愛深責切，可見尒朱榮重視尒朱天光的程度。尒朱榮雖高度評價高歡，認為「堪代我主眾者唯賀六渾耳」，並對眼中只能「統三千騎以還」的從子尒朱兆說：「爾非其(高歡)匹，終當為其穿鼻。」¹⁸⁶然而，卻將二十餘萬驍勇善戰的六鎮鎮民配給尒朱兆，¹⁸⁷以致往後當尒朱兆興兵入洛時，高歡只能試圖偷襲取勝。其後，更與他「機權之際，變化若神」的風格相悖，屢屢錯過時機，眼睜睜看尒朱兆將孝莊帝劫至晉陽後殺害。¹⁸⁸賀拔岳雖有讓尒朱榮讚嘆不已的見識，卻不敢接受征討万俟醜奴的任務，轉而推薦尒朱天光，自己則屈於副貳，尒朱榮得知後的反應卻是「大悅」。¹⁸⁹可見栽培尒朱氏子弟才是尒朱榮的真意所在，高歡也好、賀拔岳也罷，至多不過就是被尒朱氏所駕馭的副手而已。在這樣的情況下，要長保祿位就要學賀拔岳懂得適時藏鋒，否則就會與宇文泰之兄宇文洛生一般因「雄傑」而被尒朱榮所忌殺。¹⁹⁰

尒朱榮既以「主從」來界定尒朱氏與六鎮豪強之間的關係，¹⁹¹六鎮豪強對尒朱氏的向心力便不強。高歡在尒朱榮死後，即有背叛尒朱氏之意，更在獲得六鎮十萬餘眾後不久即高舉反旗；¹⁹²賀拔岳則趁尒朱天光率軍入洛的機會，響應高歡，與侯莫陳悅突襲長安，接收了以武川鎮為主體的軍隊。¹⁹³如把上述史實連結到六鎮下層鎮民對尒朱氏視其為奴的不滿，¹⁹⁴便

¹⁸⁵ 李延壽，《北史》，卷48，〈尒朱天光傳〉，頁1773-1774。

¹⁸⁶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2。

¹⁸⁷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3。

¹⁸⁸ 李延壽，《北史》，卷48，〈尒朱兆傳〉，頁1765；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31。

¹⁸⁹ 李延壽，《北史》，卷49，〈賀拔岳傳〉，頁1801。

¹⁹⁰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頁2。

¹⁹¹ 長部悅弘，〈北魏孝莊帝代爾朱氏軍閥集團再論(3)王都——霸府体制を焦点にして〉，頁30。

¹⁹²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2-215。

¹⁹³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頁3；令狐德棻，《周書》，卷14，〈賀拔岳傳〉，頁224-225。

可將之視為六鎮豪強與六鎮下層鎮民聯合對爾朱中心主義的反動。

然而這便產生了一個問題：既然爾朱榮與六鎮豪強不屬於同一類人，為何大批六鎮豪強在鎮壓變亂失敗後會競相投奔到爾朱榮旗下呢？唐長孺先生以為：

來自各地的豪強、豪強武裝最後都匯集在北秀容，形成最頑強的反動勢力。北秀容那時藏垢納穢，各式各樣的反動人物都向這裡集中，「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階級矛盾到了最尖銳的關頭，階級分野也就更加清楚。雖然北鎮起義軍的敵人不一定都到秀容，但幾乎可以斷言，在葛榮被鎮壓前投靠爾朱榮的都是一貫讎視、反抗起義軍的死敵。(筆者註：高歡、賀拔勝、賀拔岳等皆是)爾朱榮不單單是契胡部落的酋長，他的力量更不只是仗著契胡部落軍，他已是北鎮豪強的頭子，他的軍事力量乃是北鎮武裝的總匯……這些人包括不同種族，來自不同地區，有的與爾朱氏原來有關係，有的素不相識，聯繫著他們的是同一的階級利益。¹⁹⁵

唐先生把六鎮分成兩個群體，一個是鎮壓叛亂的六鎮豪強，主要是以高歡為首的懷朔豪強集團與以賀拔兄弟為首的武川豪強集團；另一個則是揭竿起義的六鎮下層鎮民。¹⁹⁶流散各地的六鎮豪強會歸附爾朱榮是因為他們有共同奮鬥的目標，即堅決血腥鎮壓六鎮之亂(同一的階級利益)。從而，比照前述爾朱榮之例，也能說六鎮豪強亦是屬於「擁魏」的一方。

我們從高歡、賀拔兄弟等六鎮豪強往後的作為也能印證唐先生的論點。首先是高歡；他曾勸爾朱榮「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河陰之變中亦極力勸阻爾朱榮篡位；¹⁹⁷而在得知爾朱兆挾持孝莊帝後，便決心不再侍奉爾朱氏，意圖在途中救出孝莊帝，以「唱大義於天下」。¹⁹⁸最後，更站在報孝莊帝之仇的旗幟下，與死忠孝莊帝的高乾兄弟、李元忠合作，舉義於

¹⁹⁴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3。

¹⁹⁵ 唐長孺，《山居存稿》，頁56-57。

¹⁹⁶ 唐長孺，《山居存稿》，頁43-46、51-54。

¹⁹⁷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1。

¹⁹⁸ 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兆傳〉，頁1765。

信都，推翻了爾朱氏的統治。¹⁹⁹賀拔勝在爾朱榮被殺後，「以為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謁帝。」²⁰⁰爾朱兆要殺他時，賀拔勝也說「勝寧負王，不負朝廷。」²⁰¹他雖再投身爾朱氏旗下，但卻在關鍵的韓陵之戰前與斛斯椿謀議誅殺爾朱氏，戰爭中更率先投降高歡。²⁰²賀拔岳在投奔爾朱榮後，便勸他要「首舉義旗，伐叛匡主。」而在爾朱榮欲篡位的當下，也說：「將軍首舉義兵，共除姦逆，功勤未立，逆有此謀，可謂速禍，未見其福。」賀拔岳雖曾勸爾朱天光要留在關中「以固根本」，²⁰³但從他早知爾朱天光必敗，卻又趁機響應高歡來看，賀拔岳的立場應與賀拔勝一致。宇文泰勸賀拔岳要「匡輔魏室」、成「桓文舉」時，賀拔岳「大悅」，²⁰⁴亦可知其「擁魏」態度。

即使掌握政權，六鎮豪強「擁魏」的政治立場也沒有改變，呂春盛先生認為：

高歡與宇文泰雖然實際掌握東西魏的實權，但雙方皆不願竄改國號，始終保留北魏原有之國號，聲稱己方才是北魏王朝的正統繼承者，這顯示經過百餘年統治之後，北魏王朝已建立相當程度的王朝權威，高歡和宇文泰都認為北魏這塊招牌尚有號召的力量，因而不敢妄加竄改。²⁰⁵

呂先生所論誠是，高歡與宇文泰不僅不敢也不願竄改國號，並以北魏正統相互標榜，成為東西魏嚴重對立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高歡、宇文泰高舉的「擁魏」立場，讓他們在擇君時皆以人心所向的孝文帝一系作為帝位繼承的正統。²⁰⁶其實不僅高歡、宇文泰，前述爾朱榮在選擇皇帝人選時便是以孝文

¹⁹⁹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4-217；李百藥，《北齊書》，卷21，〈高乾傳〉，頁290-291；李延壽，《北史》，卷33，〈李元忠傳〉，頁1202-1203。高歡與高乾兄弟、李元忠合作的詳細分析，請參胡勝源，《東魏北齊的政治與文化問題新探》，頁25-29。

²⁰⁰ 令狐德棻，《周書》，卷14，〈賀拔勝傳〉，頁217。

²⁰¹ 李延壽，《北史》，卷49，〈賀拔勝傳〉，頁1798。

²⁰² 令狐德棻，《周書》，卷14，〈賀拔勝傳〉，頁218。

²⁰³ 令狐德棻，《周書》，卷14，〈賀拔岳傳〉，頁221-224。

²⁰⁴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頁3-4。

²⁰⁵ 鄭欽仁等編著，《魏晉南北朝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2000)，頁355-356。

²⁰⁶ 何德章，〈北魏末帝位異動與東西魏的政治走向〉，《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帝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為對象。而，除了最野蠻的尒朱兆外，²⁰⁷ 尕朱世隆等人對孝文帝似乎都懷有景仰之情，《北史》，卷 48，〈尒朱榮傳〉載：

(節閔帝)又詔百官議(尒朱)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洛陽伽藍記》作：「若配世宗，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為臣不終，為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作色曰：「卿合配？」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上心，誅翦唯命。」眾為之危，季明自若。世隆意不已，乃配饗孝文廟庭。²⁰⁸

尒朱榮初次建功是在孝明帝正光年間，²⁰⁹ 依劉季明的標準，更無配饗孝文廟庭的資格。但在尒朱世隆的堅持下，尒朱榮神主最終卻配饗地位更高的孝文廟庭，此舉不僅要提高尒朱榮的歷史評價，也反映出尒朱世隆對孝文帝歷史地位的認知。

尒朱世隆對孝文帝的崇敬態度是一以貫之的。之前，當尒朱榮抉擇擁立皇帝時，是在派從子尒朱天光到洛陽與尒朱世隆密商後，才與孝文帝從子元子攸接觸。尒朱榮死後，尒朱世隆與尒朱兆擁戴太原太守元曄為帝以反抗孝莊帝。²¹⁰ 孝莊帝被尒朱兆所弑後，為了扭轉「天下皆怨毒尒朱」、²¹¹ 「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的不利局面，²¹² 尕朱世隆等人便排除尒朱兆，圖謀廢黜元曄，《魏書》，卷 75，〈尒朱世隆傳〉載：

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曄疏遠，欲推立前廢帝(元恭)。而尒朱度律意在寶炬，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彥伯密相敦喻，乃與度律同往龍花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

第18輯(武漢，2001.09)，頁51-61；胡勝源，《東魏北齊的政治與文化問題新探》，頁7-48。

²⁰⁷ 魏收，《魏書》，卷 75，〈尒朱兆傳〉，頁1661-1662。

²⁰⁸ 李延壽，《北史》，卷 48，〈尒朱榮傳〉，頁1762；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 2，「平等寺」條，頁100-101。

²⁰⁹ 魏收，《魏書》，卷 74，〈尒朱榮傳〉，頁1644-1645。

²¹⁰ 魏收，《魏書》，卷 75，〈尒朱世隆傳〉，頁1688。

²¹¹ 李延壽，《北史》，卷 49，〈斛斯椿傳〉，頁1786。

²¹² 李百藥，《北齊書》，卷 16，〈段韶傳〉，頁217。

行廢立。²¹³

參與廢立計畫的除了上述諸人外，還要加上爾朱天光，可以說，爾朱家族當權者除爾朱兆外，幾乎全數到齊。²¹⁴元曄是景穆太子的曾孫，²¹⁵爾朱世隆等嫌元曄家世「疏遠」、「非人望所推」，²¹⁶因此，他們所欲擁立的新君必定出自家世顯赫又是人望所推之門。當時他們考量的人選有二：一是孝文帝弟廣陵王元羽之子元恭、一是孝文帝之孫南陽王元寶炬，²¹⁷這與爾朱榮以孝文帝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為擁立對象是完全一致的。爾朱世隆等人想立元恭為帝是因薛孝通說他是「高祖(孝文帝)猶子，又在茂親，夙有令望。」但元恭也有缺點，他在元叉專權時為躲避政爭隱居在龍華寺，將近十年沒開口說話，²¹⁸爾朱世隆等人便懷疑他是啞巴；爾朱度律因而反對元恭，擁戴元寶炬承繼大統。但薛孝通認為元恭「不言多載，理必陽瘡」，如能「奉以為主，天人允叶」。於是薛孝通說動爾朱彥伯，讓他帶爾朱度律去查證，在證實元恭乃裝啞後，眾人再無疑義，即刻擁戴他即位，是為節閔帝。²¹⁹節閔帝與孝莊帝都是長君，都有人望，更重要的是他們皆是孝文帝兄弟子孫，孝文帝在爾朱榮等人心中的地位亦可想見。²²⁰

長部悅弘先生曾研究爾朱氏集團的內部秩序：

從孝莊帝末期，爾朱榮死後，爾朱氏軍閥集團內部分裂成支持孝莊

²¹³ 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世隆傳〉，頁1770-1771。

²¹⁴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5，頁4799。

²¹⁵ 魏收，《魏書》，卷19，〈元曄傳〉，頁508-509。

²¹⁶ 魏收，《魏書》，卷11，〈前廢帝紀〉，頁273。元曄禪讓表文中亦自稱「本枝疏遠」，參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2，「平等寺」條，頁98。

²¹⁷ 魏收，《魏書》，卷11，〈前廢帝紀〉，頁273；李延壽，《北史》，卷5，〈西魏文帝紀〉，頁174。

²¹⁸ 魏收，《魏書》，卷11，〈前廢帝紀〉，頁273。

²¹⁹ 魏收，《魏書》，卷11，〈前廢帝紀〉，頁273；李延壽，《北史》，卷36，〈薛孝通傳〉，頁1334；魏收，《魏書》，卷75，〈爾朱彥伯傳〉。

²²⁰ 此一帝位繼承世系請參文後附錄。另何德章先生認為爾朱榮立元子攸為帝是因「元子攸的銅像碰巧澆鑄成功，相信此一作法的爾朱榮才不得不立他為帝，孝文帝的嫡系子孫無疑還是爾朱榮首先考慮的人選。」何先生對爾朱榮立孝莊帝的解釋，筆者稍有異議，請參前述。而何先生強調孝文一系對爾朱榮擇君的影響，筆者完全同意。但如上文所述，出身孝文旁系若符合賢能標準亦可擁立為帝，孝莊帝與節閔帝之得立便是明顯例證。請參何德章，〈北魏末帝位異動與東西魏的政治走向〉，頁53。

帝派與抵抗孝莊帝派來看，可知，在孝莊帝時代，爾朱氏軍閥集團內部是採用以爾朱榮為領袖，尊奉孝莊帝的尊皇體制。以此產生集團的向心力，集團內部的秩序最安定。²²¹

而尊奉孝莊帝，即是尊崇孝文帝的表徵。陳寅恪先生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中論曹操〈求才三令〉的政治意涵：

然則此三令者，可視為曹魏皇室大政方針之宣言。與之同者，即是曹黨，與之異者，即是與曹氏為敵之黨派，可以斷言矣。²²²

陳先生揭示了政治路線與黨派分野之間的關係，誠是卓見。胡太后治下的洛陽朝廷會「驕侈成俗」，始作俑者正是漢化政策；而漢化政策是孝文帝的政策，如欲否定漢化政策，就必先推翻孝文帝的歷史地位。但，爾朱榮等人卻將之一分為二：胡太后及洛陽朝臣被他們視為「驕侈成俗」的代表，極端厭惡，必欲除之而後快；孝文帝卻是他們仰慕的對象，並接連在攸關國家大政走向的皇位傳承上具體展現出來。

經由上文分析，可知爾朱榮等人反對的是漢化政策的「驕侈」後遺症，而不是漢化政策的本身。此外，爾朱榮一時的權力野心與費穆提醒他要趁機剷除朝士豎立權威，避免虛實盡露無力支配洛陽，也是河陰之變的重要因素；至於，費穆的獻策，動機乃是為了追求功成名就，不惜將洛陽朝臣與禁軍給一併毀滅。因此，河陰之變與象徵漢化反動的六鎮之亂似應脫鉤，乃是一場偶發的事變。

河陰之變的影響在於爾朱榮放棄篡位的大好良機，因此他就要面對一個超乎常規的政治場域。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上，長君與強臣之間、公與私之間所需具備的手腕遠超出爾朱榮入洛之初所能料想；以他的性格與能力也無法解決如此複雜的問題，反而製造出更大的矛盾(即葉適所謂：「權與力皆不足」)。如果我們更深入來看，爾朱榮所創造出的強臣體制雖有前例，在北魏卻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勢必與延襲魏、晉以來君主集權體制的北魏政體，互相排斥。爾朱榮雖然失敗身死，但他遺留下「主弱臣強」的政治

²²¹ 長部悅弘，〈北魏孝莊帝代爾朱氏軍閥集團再論(3)王都——霸府体制を焦点にして〉，頁31。引文為筆者所譯。

²²²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51。

局面卻是往後高歡、宇文泰都必須去面對的。²²³

六、結論

陳寅恪先生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寫就《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與《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二書，以「見人所不能見」的卓越史識，奠定現代中古史學的基礎。即使在七十年後，陳先生超越當代的問題意識、「不疑處有疑」的研究方法、堅持學術思想獨立自由的精神，依然讓人為之傾倒。然而，陳先生並無一安定環境去慎密其理論，乃從宏觀著手，指引出歷史長河的流向，細部方面論證難免有所遺漏，即便如此，並無損陳先生的偉大，反而讓後世學者有機會沿襲陳先生的腳步，將園地擴大，這也是筆者寫作本文的初衷。

本文認為，爾朱榮與孝莊帝能順利合作，關鍵在於兩人皆是忠於孝明帝的帝黨。然而，爾朱榮卻在河陰犯下了人神共憤的罪行，他雖醒悟，請求孝莊帝的諒解，可是河陰之變始終是橫亘在兩人之間的陰影，這也激發爾朱榮平亂的鬥志，六鎮之亂、元顥入洛等亂事都因他才能平定，一定程度上扭轉孝莊帝與洛陽朝臣對他的看法。可是，天下大定後，爾朱榮與孝莊帝的關係因權力分配而急速惡化。爾朱榮雖無謀反之心，可是他立下的功業太大，且在遷都一事上，讓孝莊帝以為河陰之事可能重演，最終便註定了爾朱榮的悲劇。

河陰之變的性質，從爾朱榮擁立孝莊帝、爾朱榮在河陰變後的作為、爾朱榮對六鎮鎮民、六鎮豪強的態度、爾朱氏以孝文帝一系為主的擇君標準、費穆追逐功名的獻策等方面來看，皆表明與象徵漢化反動的六鎮之亂並不類似，乃是一偶發的事變。河陰之變的影響則在是爾朱榮最終放棄篡位，從而開創出與傳統北魏君主集權政體摩擦不斷的強人體制，而「主弱臣強」的政治格局並沒有隨爾朱榮身死而消失，反而演變成東、西魏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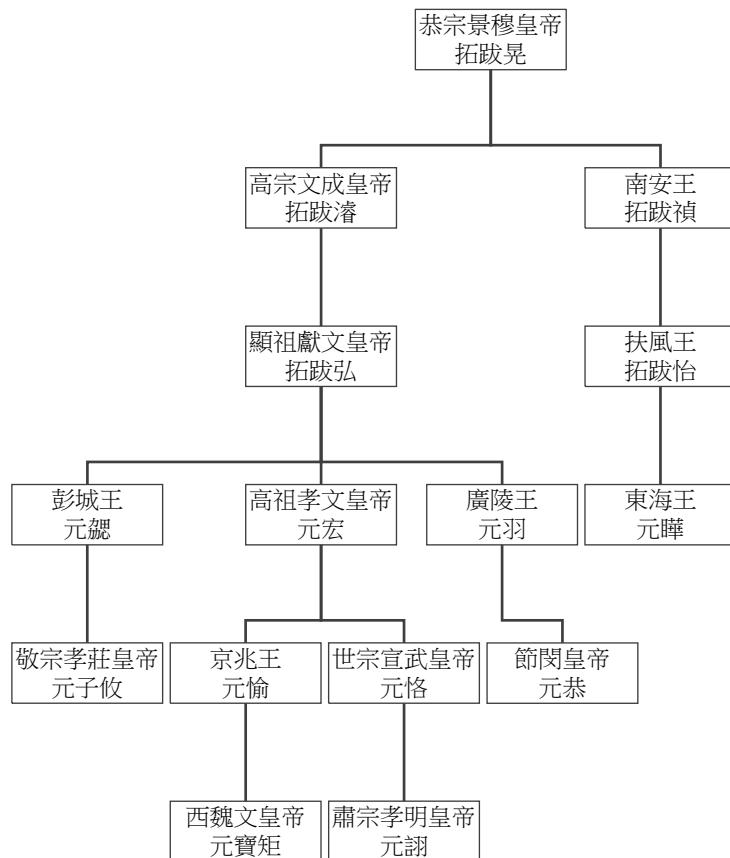
²²³ 「主弱臣強」一詞，出自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0，點校本），卷68，《霍光傳》，頁2954：「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

治發展的根本架構。

陳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曾指出隋朝典制大體承襲北齊，而北齊之制又是繼承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成果，顯然陳先生早已注意到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的重要性；然而，陳先生同時也指出六鎮之亂以及隨後的河陰之變是對北魏孝文帝漢化政策的反動。但若將六鎮之亂與河陰之變皆視為是漢化政策的反動，那麼尗朱氏、高歡與宇文泰尊奉孝文帝的舉動便不可理解。若如本文所言，將漢化反動的範圍限於六鎮之亂，把河陰之變定位為一偶發事變，便能發現孝文帝除了在制度上，在政治走向上都給予後世深刻的影響。如此，不僅能完備陳先生的理論，也會延伸出更多的討論面向，如：尗朱氏與高歡、宇文泰為何會如此仰慕孝文帝？承襲孝文帝改革成果的東魏北齊是否能定義為「鮮卑化」政權？西魏北周復古改革中孝文帝改革成果的影響程度為何？這些問題，應能對從重新認識隋唐帝國形成的根本因素有所助益。

本文不足之處所在多有，如研究方法著重在瞭解歷史人物的想法，進而架構出整體歷史氛圍。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對於歷史人物，我們也只能以其行為推測其想法，而推測本身便蘊含不確定性，讀者亦可以此否定本文所論。然而，歷史的機變曲折之處，往往隱含在史料底層，若無適當的推論，將難以明白。以諸多間接證據進行推論，進而得出一可能性較強的說法，在史學方法上這樣的論證應可成立。此外，在立論方面，本文雖指出尗朱氏、高歡、宇文泰與六鎮下層鎮民對北魏朝廷的立場不同，受限筆者學力與史料缺乏，箇中因由卻仍不甚了了。君臣關係是本文關注的重點，但尗朱榮從愧對到輕視孝莊帝的變化，也因同樣緣故，無法提出解釋。上述所舉僅是犖犖大者，本文仍存在許多缺漏，尚祈博雅君子不吝教誨。

附錄：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史料文獻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點校本。

Sima, Qian. Shi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59, dian jiao ben.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0，點校本。

Ban, Gu. Han s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60, dian jiao ben.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點校本。

Fan, Ye. Hou Han S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64, dian jiao ben.
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Yang, Xuanzhi, zhuan, Zhou Zumuo, Jiaoshi. Luo yang qie lan ji jiao shi, Shanghai:
Shanghai shu dian chu ban she, 2000.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點校本。

Wei, Shou. Wei s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4, dian jiao ben.
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點校本。

Linghu, Defen. Zhou s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1, dian jiao ben.
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點校本。

Li, Baiyao. Bei qi s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2, dian jiao ben.
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點校本。

Li, Yanshou. Bei sh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4, dian jiao ben.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點校本。

Sima, Guang. Zi zhi tong jia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56, dian jiao ben.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點校本。

Ye, Shi. Xi xue ji yan xu m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7, dian jiao ben.
王夫之，《讀通鑑論》，臺北：里仁書局，1985。

Wang, Fuzhi. Du tong jian lun, Taipei: Li ren shu ju, 1985.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

Zhao, Yi, zhu, Wang Shumin, jiao zheng. Nian er shi zha ji jiao zheng, Beijing:
Zhong hua shu jyu, 2001.

(二)近人著作

- 小島典子，〈北魏末期の爾朱榮〉，《史窗》，第58期(京都，2001.08)，頁317-328。
Kojima, Noriko. “Kita Gi makki no Jishu ei,” *Shisō*, dai 58 ki (Kyōto, 2001.08), 317-328.
- 王延武，〈北魏末的文化模式與爾朱榮的敗亡〉，《中南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武漢，2003.06)，頁105-109。
Wang, Yanwu. “Bei wei mo de wen hua mo shi yu er zhu rong de bai wang,” *Zhong nan min zu da xue xue bao*, di 1 qi (Wuhan, 2003.06), 105-109.
- 王愛玲，〈爾朱氏與北魏政治〉，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Wang, Ailing. “Er zhu shi yu bei wei zheng zhi,” Taipei: Zhong guo wen hua da xue shi xue yan jiu suo shuo shi lun wen, 2006.
-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臺北：開明書店，1969。
Lu, Simian. *Liang jin nan bei chao shi*, Taipei: Kai ming shu dian, 1969.
- 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Gu chuan, Dao xiong. *Sui tang di guo xing cheng shi lun*,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4.
- 何德章，〈北魏末帝位異動與東西魏的政治走向〉，《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8輯(武漢，2001.09)，頁51-62。
He, Dezhang. “Bei wei mo di wei yi dong yu dong xi wei de zheng zhi zou xiang,” *Wei jin nan bei chao sui tang shi zi liao*, di 18 ji (Wuhan, 2001.09), 51-62.
- 宋大川、夏連保，〈北魏河陰之變述論〉，《晉陽學刊》，第5期(太原，1991.05)，頁67-71。
Song, Dachuan, Xia Lianbao. “Bei wei he yin zhi bian shu lun,” *Jinyang xue kan*, di 5 qi (Taiyuan, 1991.05), 67-71.
- 李文才、王婷琳，〈爾朱氏興衰的政治與文化考察〉，《南京曉莊學院學報》，第4期(南京，2007.04)，頁25-30。
Li, Wencai, Wang Tinglin. “Er zhu shi xing shuai de zheng zhi yu wen hua kao cha,” *Nanjing xiao zhuang xue yuan xue bao*, di 4 qi (Nanjing, 2007.04), 25-30.
- 周一良，《周一良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Zhou, Yiliang. *Zhou yi liang ji*, Shenyang: Liaoning jiao yu chu ban she, 1998.
- 長部悅弘，〈北魏孝莊帝代爾朱氏軍閥集團再論(3)王都——霸府体制を焦点にして〉，《琉球大学地理歴史人類学論集》，第1期(沖繩，2010.03)，頁17-32。
Osabe, Yoshihiro. “Kita Gi Kyōsō tei dai Jishu shi gunbatsu shūdan sairon (3) Ō – to: ha fu taisei wo shōten nishite,” *Ryūkyūdaigaku chirishi rekishi jinruigaku ronshū*,

- dai 1 ki (Okinawa, 2010.03), 17-32.
- 吳少珉，〈試論北魏「河陰之變」〉，《史學月刊》，第1期(開封，1983.01)，頁24-27。
- Wu, Shaomin. "Shi lun bei wei 'he yin zhi bian,'" *Shi xue yue kan*, di 1 qi (Kaifeng, 1983.01), 24-27.
- 胡勝源，〈東魏北齊的政治與文化問題新探〉，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5。
- Hu, Shengyuan. "Dong wei bei qi de zheng zhi yu wen hua wen ti xin tan," Hsinchu: Guo li qing hua da xue li shi suo shuo shi lun wen, 2005.
- 唐長孺，《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2011。
- Tang, Changru. *Shan ju cun gao*,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11.
- 唐長孺，《唐書兵制箋正(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11。
- Tang, Changru. *Tang shu bing zhi jian zheng (wai er zhong)*,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11.
-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
- Chen, Yinke. *Sui tang zhi du yuan yuan lue lun gao*, Beijing: San lian shu dian, 2001.
-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
- Chen, Yinke. *Tang dai zheng zhi shi shu lun gao*, Beijing: San lian shu dian, 2001.
-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
- Chen, Yinke. *Jin ming guan cong gao chu bian*, Beijing: San lian shu dian, 2001.
- 陳寅恪講述、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雲龍出版社，1995。
- Chen, Yinke, jiang shu, Wan Shengnan, zheng li. *Chen yin ke wei jin nan bei chao shi jiang yan lu*, Taipei: Yun long chu ban she, 1995.
- 陳爽，〈河陰之變考論〉，《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4集(北京，2007.08)，頁309-344。
- Chen, shuang. He yin zhi bian kao lun,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yuan li shi yan jiu suo xue kan," di 4 ji (Beijing, 2007.08), 309-344.
- 陳識仁，〈《洛陽伽藍記》與北朝史學〉，收入宋德熹編，《中國中古社會與國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
- Chen, Shiren. "Luo yang qie lan ji' yu bei chao shi xue," shou ru Song Dexi bian, *Zhong guo zhong gu she hui yu guo jia*, Taipei: Dao xiang chu ban she, 2009.
- 黃修明，〈論爾朱氏軍事集團〉，《四川社會科學院學報》，第5期(成都，1990.05)，頁84-91。

- Huang, Xiuming. "Lun er zhu shi jun shi ji tuan," *Sichuan she hui ke xue yuan xue bao*, di 5 qi (Chengdu, 1990.05), 84-91.
- 鄭欽仁等編著，《魏晉南北朝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2000。
- Zheng, Qinren, deng bian zhu. *Wei jin nan bei chao shi*, Taipei: Guo li kong zhong da xue, 2000.
- 鄭建民，〈爾朱集團和北魏末期的政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Zheng, Jianmin. "Er zhu ji tuan yu bei wei mo qi de zheng ju," Shanghai: Hua dong shi fan da xue zhong guo gu dai shi yan jiu suo shuo shi lun wen, 2008.
- 窪添慶文，《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
- Kubozoe, Yoshifumi. *Gi Shin Nanbokuchō kanryōsei kenkyū*, Tōkyō: Kyūko Shoin, 2003.
- 蘇小華，〈試論爾朱氏集團的興亡〉，《晉陽學刊》，第3期(太原，2005.03)，頁68-71。
- Su, Xiaohua. "Shi lun er zhu shi ji tuan de xing wang," *Jinyang xue kan*, di 3 qi (Taiyuan, 2005.03), 68-71.
- 饒宗頤，《中國歷史上之正統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 Rao, Zongyi. *Zhong guo li shi shang zhi zheng tong lun*, Shanghai: Yuan dong chu ban she, 1996.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He Yin Incident: A Discussion Centered upon Er-Ju Rong

Hu, Sheng-yua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 regards to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traditional historians have placed a heavy emphasis upon the Yi-Xia distincti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an Chinese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Most consider the Sinicization of Emperor Xiaowen in Northern Wei as the root cause of the He Yin Incident. The Hu ethnic background of Er-Ju Rong is often cited as the foundation of his political inclination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go back to the context of Northern Sung history and reinvestigate the causes and influences of the He Yin Incident. To do this, the author will focus on Er-Ju Rong's relationships with Emperor Xiaoming and Emperor Xiaozhuang, and his high regard of Emperor Xiaowen's lineage.

In regards to the causes of the He Yin Incident, this study will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r-Ju Rong, Yuan Zi-You, and Emperor Xiaoming.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both Er Ju-Rong and Yuan Zi-You are loyal to Emperor Xiaoming, which enabled them to cooperate in overthrowing the rule of the Great Empress Hu. The He Yin Incident started as a strategic suggestion from Fei Mu to Er-Ju Rong. This study ascertains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aversion towards the Sinicization policy by Fei Mu and the Imperial Guards is unlikely. It is theorized that Fei Mu proposed this suggestion due to his thirst for power and fame. Most of the historical community classified the Er-Ju family as being in the same vein as the people of the six cities. In this study they are classified as the Er-Ju Family, the powerful elites of the six cities, and the common people of the six cities in lower social classes. The Er-Ju family does not belong

to the same class of people as the powerful ones of the six cities. They joined forces during the oppression of the anti-sinicization rebellion in the six cities only because of their common support of the Wei Dynasty.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close ties which between the emperors who enjoyed their support.

In relation to the influences of the He Yin Incident, this study states that the He Yin Incident made Er-ju Rong desirous of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amend his crimes, which led to his great achievements. But the issue of moving the capital reminded Emperor Xiaozhuang of the examples set by Dong Zhuo,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is enormous fame in war made emperor Xiaozhuang uneasy of his presence. This finally led to Emperor Xiaozhuang's decision to kill Er-Ju Rong. During the He Yin Incident, Er-Ju Rong passed over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the throne for himself, which created an unprecedented system of "weak master, strong subject" and was the cause of continuous confrontations between him and Emperor Xiaozhuang. After Er-Ju Rong's death, both Gao Huan and Yu-Wen Tai inherited this system, which became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politics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Wei Dynasties.

Keywords: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e Yin incident, Er-Ju Rong